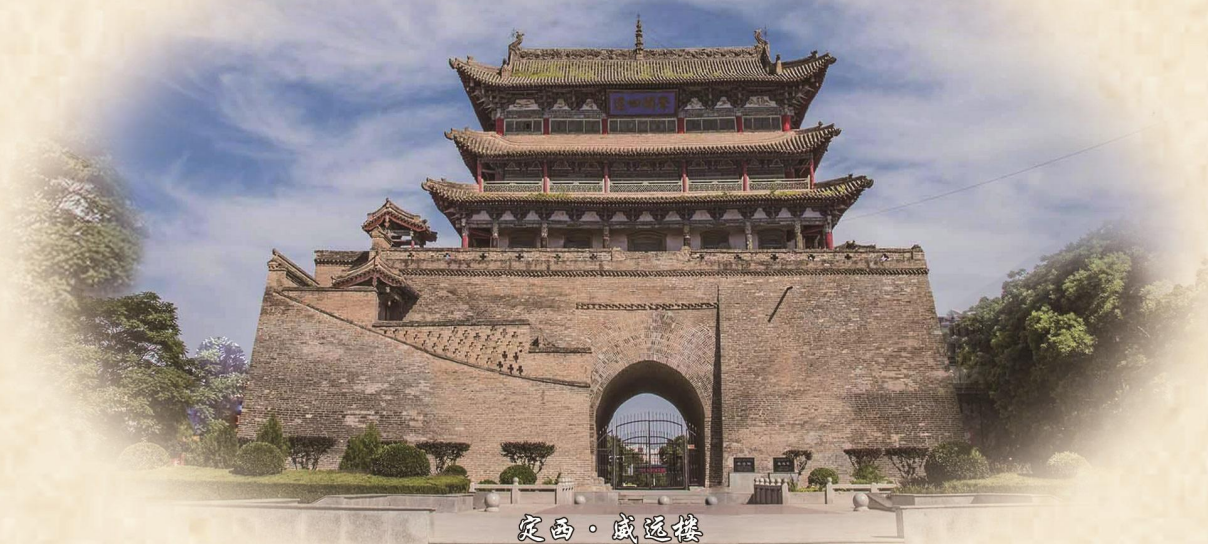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定西·威远楼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9·2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李振宇 徐大武 张正龙 石为怀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生 牛述林 朱克雄 祁雪峰 李宽余

何成才 汪举红 张占社 张军平 陈 谦

罗文擘 郑天水 赵存福 贺红梅 高 中

高生军 梁兴明 彭晓峰 雷 丽 谭得胜

主 编：张正龙

副主编：张占社

编 辑：牛建文 王 华 李佳潞 蒋文涛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38期

2019·2

·史地考述·

陇东地区商周方国述略

华 丹 陈 谦·4·

豳地望考

汪受宽·11·

·方志文化·

从“史‘志’”到“方‘志’”

潘捷军·19·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地方志事业大发展

李振宇 高天成·35·

·人物春秋·

辛树帜的兰州大学情怀

张 慧·43·

·年鉴编研·

地方综合年鉴编辑中的一些问题及解决办法

滕 辉·47·

GANSU SHIZHI

· 志稿述评 ·

二轮《民乐县志》述评

张志纯 · 53 ·

· 文化传承 ·

《潜夫论》引《诗》的理论建构与《诗》史价值

赵玉龙 · 57 ·

赋比兴在西和乞巧歌中的应用

魏泽民 马 莉 · 70 ·

· 史海钩沉 ·

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建制始末及作用

张益明 张雅淇 · 77 ·

· 志鉴信息 ·

二轮《甘肃省志·邮政志》等5部省志和《天水市志》通过终审

· 34 ·

陇东地区商周方国述略

华 丹 陈 谦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境内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印记。1976年在泾川县牛角沟发现的“平凉人”头盖骨化石标本，距今已有3~4万年的历史。也是1920年由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华池县辛家沟发现我国打制石器的第一块标本。距今约4800~6万年的大地湾文化，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主要源头。继大地湾文化之后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遍布甘肃的许多地域，把甘肃史前文化推向了空前的高度。正当甘肃史前文化昌盛发展、临近文明大门的关键时期，发生的一次小冰河期，使甘肃地区的气候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度繁荣的齐家文化迅速衰落，社会进程明显滞缓，代之而起的是若干分散的、以游牧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地域性青铜文化，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强势部族，组建起足以合并诸共同体的贵族制国家，甘肃由此拉开了同中原地区的差距。就在中原地区历经夏、商、西周三代王朝，贵族社会越来越走向成熟的

时候，甘肃大部分地区却长期处于众多牧猎部族互不相属、流徙无定的状态，只在陇东地区兴起了一些小型方国。

广义的陇东，是指陕北狭地以西、六盘山以东，涵盖现在的平凉、庆阳两市的广袤区域。陇东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具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又因靠近关中而最先接受了华夏文明的影响，所以有不少部族共同体能较早地演进为城邦性方国，并与中原王朝建立起某种依附关系。其中一些实力较强的方国，如姬周族在陇东黄土塬上建立的豳国，奠定了周王朝800年基业。嬴姓族在西汉水上游建立的嬴姓国，辗转动迁陕西、陇东部分地域，发展到后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王朝。除此之外，商周时期甘肃东部境内还有许多方国，如阮、共、密须、吕、芮、申等小的方国，由于无信史可鉴，且缺乏有力的考古发现来例证，这些方国的地域、族姓来源等千百年来都没有形成共识。现根据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就上述方国有关问

题做以综述。

阮国、共国

阮、共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皇矣》：“密人不恭，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关于此段记述，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存在一国说、二国说、三国（四国）说。

一国说。《诗经全译》引唐代孔颖达释：“有密国之人，乃不恭其职，敢距逆我大国，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往复侵共。”《诗经·朱注》宋朝朱熹释：“阮，国名，在今泾州。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今泾州之共池是也。”《诗意折中》引清朝傅恒等释：“密、阮皆国名；共，阮邑；距，拒。”

二国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阮，古国名，文王所灭。《诗·大雅》侵阮徂共，其地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古国名，文王所灭，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皇清经解》引清朝戴震释：“阮与共，宜皆周地，而阮则周之疆域接于密者。”《经学辑要》引清朝马端辰按：“侵阮徂共承上敢距大邦而言之，毛传言密须侵阮遂往侵共是矣。《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正与毛传合。郑笺从鲁诗，以阮、徂、共为三国，不若毛传为允。”《辞海》载：“阮，古国名，堰姓，在甘肃泾川，为周文王所灭；共，古国名，有二：其一，在甘肃泾川北。其二，在河南辉县，西周时

为共伯封国。”《辞源》载：“阮、商代诸侯国名，堰姓，地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共，古国名，在今甘肃泾川县北”。

三国（四国）说。《皇清经解》引清朝陈启源释：“毛以阮、共、旅为周地名，而徂为往。郑以阮、徂、共为三国名。徂旅为祖国之旅。毛以阮、共为密所侵，而文王侵之。郑以阮、徂、共为密人之党，而文王侵之。”《皇清经解》引清朝焦循释：“侵阮徂共，毛传谓：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郑玄笺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乃敢拒其义兵。’这里有两组“三国说”，即阮、共、旅和阮、徂、共，同时也形成了“阮、共、旅、徂”之“四国说”。

以上三种说法中，目前史学界主流观点认同二国说。翻阅历代出版的地方志书及权威工具书，大都认可这一观点。明《平凉府志》在泾川建制沿革部分记载：“泾川商周时为阮共故地。”清乾隆《泾州志·地輿志》载：“泾于天文为东井，居泾之阳，商周阮共之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泾州乡土志》历史部载：“泾州于天文为东井，居泾水之阳，商周时为阮共，在魏亦曰密”。民国《泾川县志》地輿志载：“泾川禹贡为雍州之属，周为豳地，《诗》‘苗鞠之即可征也。’且为‘阮地共地’，《诗》‘侵阮徂共’又可征也。”“商：密须了爵商侯国与阮皆隶即今本县之东半面”。“周：阮共。阮，古国名。为文王所灭，《诗·大雅》‘侵阮徂共’，其地在今本

县东南。共，古国名。为文王所灭，其地在今本县北五里，《诗·大雅》‘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以上均见《古今地名大辞典》。”从以上地方志的记载中，阮、共的确属于两个并列的名词，代表了历史上两个并列的方国。而且在《泾川县志》所引据的《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明确记载阮国隶本县之东北面，共国在今县北。甘肃省平凉市史志办原主任祝世林认为：“商代末期，周族兴起于渭水流域，那时地区南部有密须国，在今灵台县境；有共国、阮国，在今泾川县境，共、阮是周之属国。”阮国在泾川县东部，泾川县水泉寺有共池，相传为共国都城遗址。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一次文物普查资料统计，泾川境内共发现商周文化遗址42处（不包括以后新增加的内容），遍布全县各个乡镇，有些遗址暴露面积大，内含丰富，大多数遗址埋藏较深，地面只能捡到少量陶片。从泾川出土商周铜器情况看，东部有泾明蒜李，出土了商晚期有族徽文字的兽面纹鬲，墓中有腰坑、殉狗。南部有黑河焦村，出土西周铜鼎、铜簋各一件。西部有党原，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銎铃、车害等车马器。北部有玉都下塄，出土过商代铜觚、铜爵。中部水泉寺有共池和盘顶子夯土台遗址。共池在今水泉寺（今城关中学）院内，为一长方形石砌水池，中有瓦亭，方广一亩，是史学公认的、史书上记载最早的共的唯一标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被列为泾州八景之一，名曰“共池涌

碧”，1980年前后被填平，遗迹尚在。可以肯定地说，泾川东到蒲河、南到黑河、西到党原、北至红河一带，均有商周方国的遗迹。从以上平、庆地区本土文化学者研究成果以及现有文化遗存、出土文物不难看出，共国当在今泾川县水泉寺一带，阮国在今泾川县东部的泾明乡一带。这个结论与历史上既有的“二国说”诸观点一致，也是《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权威典籍中普遍采用的说辞。至于三国、四国说，虽有学者提出，但由于缺乏典籍标注及切实的考古发现，只能视为是这一种业已存在、但尚无结论的学术探讨。

密须国

密须国始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起，古文献中关于密须的记述，都发生在商代后期及西周。先周时期，文王扩充实力的五伐，在《诗经》里列举者仅有伐密、伐崇，可见密须国在当时的地位并非一般。其灭亡的时间，《史记·周本纪》有明确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算，文王灭密须的具体时间应在公元前1057年。

关于密须国地望，文献中记载相对较多，引瓚曰：“安定阴密县是。”《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下：“阴密县，《诗》密人国。”《后汉书·郡国》杜预注：“安定阴密县，古密须国。”《读史方輿纪要》卷58：“阴密城，县西五十里，志云：故密国也，周文王伐密，诗所称‘密人不恭’此矣。”1935年

《重修灵台县志》所记更为具体：“密须国故城址在县西50里，即今之百里镇也”。

百里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地下发掘材料亦证明了文献所载密须故城及密须国地望是完全正确的。今之百里镇城垣有两处。第一阶台地内城垣基本完整，据《重修灵台县志》载，建于明代。早期故城建于第二阶台地内，留有残迹三处。据乾隆版《甘肃通志》载：密县故城为“唐贞观年间武康郡王李元谅筑之”。经实地考察：故密城在吴家山山脚下，残存的三段为西、北城墙残存高不过3米，最长一段约为10米，底宽2.5米左右，近底部处夯土层厚约6~7厘米，内含仰韶文化和周代陶片；上部夯土层厚13~14厘米，内含汉代砖瓦残片和宋瓷片，周长3华里，由此可以看出，故城年代久远，汉、唐、宋均在原有城址基础上加固维修，继续沿用。故城南侧，当地群众俗称“南将台”，当地农民修穴式庄基时，断面上暴露出西周灰坑、住室、灶坑等，文化层厚达2米左右，是一处周代文化遗址，内含大量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片，多为扁、豆、罐等器残片以及铜徽、兽骨之类，同时在遗址内发现宋代瓷器窖藏一处。故城东、洞山之北，距河床高约30米的台地上有一处仰韶、齐家、周代文化遗址，范围约为200×30米，内含大量彩陶和夹砂灰陶片。遗址内外为东西两周墓葬区。

1972年姚家河西周墓葬中出土铜、陶、蚌器147件，主要有鼎、陶鬲等，据鼎内壁铭文，约当为康王时期器物。1973年洞山发

掘的东西两周墓葬中，一座西周墓出土器物11件，有鼎、尊、戈、贝等。一件大鼎与大孟鼎相似，重43公斤，直耳，柱足，鼓腹。足半空与腹相接，腹上部饰簠餐纹6组，三足下部各饰簠餐纹1组，是目前甘肃省出土最大的铜鼎，根据内壁铭文，约为康王前后遗物。发掘的8座东周墓出土器物61件，大部分为陶器，其次是石器、玉器和蚌器，为春秋中晚期古墓。1967至1972年白草坡发掘的9座西周墓葬中出土铜、玉、陶、石、蚌器共计123件，根据墓葬发掘的不同时间，各类器物造形、纹饰方面的差异，被断为康王至穆王时代的遗物。1975年寺沟西周墓内出土器物61件，主要有鼎、陶属，断为穆王时代遗物。1976年郑家洼西周墓内出土器物16件，断为武、成王时代遗物。1981年红崖沟西周墓出土器物11件，被断为穆共时期器物。1967年至197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灵台县文化馆先后发现和清理东西两周古墓23座（其中东周墓8座），出土铜、陶、玉、贝、石等各类器物达1500余件。多为成、康、穆、共之际墓葬，东周墓被断为春秋中晚期。这些古墓均分布于密城周围，最近的1公里，最远的60公里。

以上考古发掘的西周墓葬或在百里镇范围内，或是离百里镇极近，均是围绕“密城”而存在。综上所述，密须国的地望在今灵台百里镇当无大的争议。

关于密须国的族姓，《史记集解》应昭曰：“密须氏，姁姓之国”。《通志·氏族略》也说：“密须氏，《世本》商时姁姓之国。”

又云：“《史记》姑氏为后稷之妃。南燕、密须皆姑姓之国，后改为吉氏。”从姓氏起源看，黄帝姬姓部落原来包括二十五个氏族，后来发展成为十四个部落，除两个部落保持姬姓，又出现了十一个新姓，姑姓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姑姓一部分在山西境内，即后来的南燕，另一部分即密须氏，他们在迁徙泾水支流达溪河流域后，历经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禹、夏、商，经一千六百多年，开山辟水，依原始的狩猎及农业经济，生养繁衍，由弱到强，至迟在商朝时，已成为泾水流域强盛一时的奴隶制方国。周文王灭密须后，姑姓后裔开始以国名为姓，改称密姓。

芮

芮国是我国先秦时期众多方国之一，《诗经·大雅·绵》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这是最早记载有关芮国的文献，说明芮在商末便已存在。《史记·周本纪》记载了虞、芮两国因田地争纷而去请求文王定夺这一事件。从文献中大致可以得出，此时的虞、芮两国毗邻，所以才会让文王去定夺关于两国田地的纷争。关于“相与争田”的虞、芮两国的地望目前有两种观点：一为虞、芮故址分别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境内和今山西芮城县境内。另一说法是争田的虞国在陕西省陇县境内，芮国在今甘肃省华亭县和崇信县境内。

《史记正义》引毛传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只有两国位置毗邻、国

土相连，才可能发生土田争讼。商末的虞（矢）国在陇县、千阳一带，正好邻近泾河上游地区。此外，根据历代学者研究，文献中“芮”通“汭”，水名。《太平寰宇记》陇州汭源县下引《水经注》（轶文）云：“芮水出小陇山，其川名汭。”商代晚期已有芮水之名，《诗·大雅·公刘》“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郑笺曰：“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鞠。外即南，内即北也。”“芮鞠”即芮水之南，正好是古密国的位置。芮水之名后代一直沿用，《汉书·地理志》：“芮水出西北，东入泾。”《隋书·地理志》：“华亭，大业初置。有陇水、芮水。”今天的芮河发源于华亭县陇山东侧，流经崇信县北部，在泾川县城北注入泾河，它是否为古文献中的芮水？《读史方輿记要》持肯定观点。因此，芮国早期居地与古芮水有关，且与虞（矢）国邻近。从今芮河、黑河流经的地望看，灵台县属古密国范围，位置均偏东，故早期芮国只能在华亭、崇信两县境内去寻找。陇县北部及华亭县南部应即“虞芮争讼”之地，地处两国边境，芮国的地望应在今甘肃省华亭县和崇信县境内。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李竞恒所著的《商周时代的芮国》一文中通过对《广韵》及清人雷学淇的《竹书纪年义正·武公纪》等文献的考察研究，指出文王时期和武王克商后的芮国不仅不为同一国家，且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相同。经过武王克商的巨变后，当时原有诸侯国所处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姬姓的芮国则可能

是在此次变革中周王室有意扶植起来的。而这一芮国可能是周王室对殷商时期芮国扶植后而改封的，其政治地位以及在周王室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远远大于商末的姜姓芮国。

近年在陕西韩城市梁带村发现了大型周代墓地，共探出墓葬上千座，车马坑17座，发掘中字型大墓1座（M27），甲字型大墓2座（M19，M26），随葬青铜礼器有“芮公”“芮太子”“芮太子白”等铭文。有学者将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出土的青铜器提梁卣与1998年陇县出土的一件青铜方座簋纹饰比较，并对M27、M502出土的耳形钺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M27所出耳形钺时代为西周早期，M502所出耳形钺时代为西周晚期，此类钺在芮国或是一种传统文化因素，而这种文化因素还出在灵台百草坡，于它处并不见，所以才可能使用基本相同的器物和文化因素。因而可以进一步将古芮国的方向缩小在陕甘交界一带。另一方面，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宝鸡陇县一带商末周初的矢国即为商末时期的虞国所在，其与华亭县接壤，所以也符合虞芮争田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因而殷商时期的芮国在今甘肃省华亭县和崇信县境内这一说法是合理的。

申国

姜姓申氏早就存在，《五祀卫鼎》铭文中有“厉有司申季”，是邦君厉的办事官员，年代在共懿时期。南阳的申是在宣王时徙封的，金文中明确称之为“南申”，以

相对于“西申”而言。《古本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这个“西申”就是当时申侯的封邑。西周末年西申与王室联姻，势力很大。新出清华简《系年》云：“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并言及西周王室的覆灭，“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bi）。缙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从《史记·秦本纪》中申侯与嬴秦大骆联姻的历史看，西申与秦的位置不远，当在陇东一带。《山海经》有“申首之山”“申水”，坐落在洛河源头白于山和泾河源之间，白于山为今横山山脉西段（今合水县），泾河源于六盘山东麓（今泾源县），据以推测西申可能位于今平、庆地区。这一推断从庆阳合水县何家畔乡南硷发现的商周墓葬也可得到验证。该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二层台，出土铜器8件，还有贝器、骨针等。铜器中有窃曲纹附耳鼎1件，敛口，宽斜沿，方唇，浅半球形腹，圆底，马蹄足，口沿下饰一周“S”形带目窃曲纹，蹄足较矮，沿下饰重环纹及凸弦纹。附耳鼎内壁铸有铭文，共6行61字（重文1字）：“隹王三月初吉辛丑，白（伯）硕父作尊鼎，用尊用行，用考（孝）用享于卿事辟王、庶弟元兄，我用爰司（赤）戎、馭方，白（伯）硕父、申姜其受万福无疆，蔑天子光，其子孙永实用。”铭文中伯硕父负责管理赤戎及相关的北方边境民族事务，他能执掌此类事务与其夫人出自西申有很大关

系。在秦崛起之前，代表周王室主管西戎事务的大臣其实是申侯。即便在秦庄公受封为西垂大夫之后，陇山以东仍属申国势力范围。申侯世袭，职务亦然。西周中期申侯与嬴秦联姻，使“西戎皆服”（《秦本纪》），孝王元年曾“命申侯伐西戎”（《今本竹书纪年》）。幽王时的申侯在其外甥宜臼被废后，招来犬戎攻杀幽王。庆阳伯硕父鼎的意义首先在于证实了西周晚期西申的存在，并为确定其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伯硕父鼎出自墓葬，那里应有一片家族墓地，尚需进一步勘探。墓葬附近有面积较大的西周遗址，值得详细调查。南硷墓葬位于马莲河西岸，西申距之不远，当在马莲河流域一带的陇东地区。

吕国

吕在文献中常写作“甫”，与申同源，出自西土姜姓集团。《大雅·崧高》中甫（吕）与申并举，“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可见二者关系密切。吕氏在西周金文中很活跃，出现过多次，而且地位不低。穆王时《班簋》铭文中周王命毛公东征，令吴伯和吕伯率各自属下军队为毛公的左右两翼，吴伯为右翼统帅。西周恭懿时的《吕服余盘》铭文中吕服余袭祖父旧业，“司六师服”，也就是管理西六师的戎服。从铭文的点滴信息看，商周时期吕氏封地应在关陇地区。吕氏在西周时曾经称王。传世的吕王壶铭文曰“吕王造作内（芮）姬尊壶，其永宝用享”，是吕王为其夫

人芮姬作器。该器未见器形，但铭文笔画中间肥厚，两端尖锐，有西周早中期特点。吕、芮联姻，早期芮国在甘肃华亭、崇信县境内，吕国应距之不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在灵台县西岭西周墓出土了一件吕姜蔓，敛口圈足，圈足下接三个很高的柱足，器身饰瓦纹，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器内底铸四字“吕姜作篡”，是出自吕国、嫁到灵台的姜姓女子所作器物。这两件铜器铭文把吕国的地望锁定在泾河上游。

泾河上游地区有两条蒲河，一条在镇原县，东南向注入黑河，后在宁县西南注入泾河。该河至明清已有其名，《读史方輿记要》（庆阳府）：“黑水河府西百二十里，源出太白山。……府南有蒲川水，流合于黑水河。”另一条在灵台县，《太平寰宇记》泾州灵台县下引《水经注》轶文云：“蒲川水出南山蒲谷，东北合细川水，又东北合且氏水。”细川水即灵台百里镇附近、达溪河南岸支流南河，又称“百里细川”。从地理形势看，《水经注》轶文把今天的达溪河称为“蒲川水”，可见吕国居地和名“蒲”的河流有关，因此，最初吕国古地望应在今陇东地区。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豳地望考

汪受宽

殷商时期，周人先祖不窋由关中北行，定居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建立豳国^①，积聚实力，争取民心，历经十余代，前后三百余年，到古公亶父时迁往周原，成就王业。豳国是周族由一个西方小部族变成文明礼仪之邦的关键时期。古人说豳为“周家立国之本”，“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②。弄清豳国的正确位置，对于先秦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在讨论豳的地望之前必须先给豳的概念定位。《史记·周本纪》言：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

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豳，既指不窋至古公亶父的诸位周先公所居“戎狄之间”的大范围的豳地区，又特指公刘、庆节至古公亶父所居的豳国或其都城之豳邑。豳的概念之所以从大到小，是因为周人既居于戎狄之间，又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其所活动的范围必然较大，甚至有多次迁徙。本文所要考证的，是公刘豳国都城豳邑的地望。

历代关于豳国的地望，有多种说法。

最早为汉栒邑县境说。班固《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下，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邑。”

第二种是稍迟于班固的东汉文字学者许慎的汉美阳（今陕西武功境）说。《说文解字·邑部》载：“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从邑分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

俗以夜市，有豳山。”美阳，在今陕西武功西北。此说当与汉宣帝时发现的一尊周鼎有关。《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宣帝时，右扶风美阳县发现一尊有铭文的鼎，京兆尹张敞释读鼎上文字为：“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赐尔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共32字，因汉人多有“枸邑，即豳地是也”的共识，可能许慎遂称豳在美阳。然而，鼎是可以移动之物。张敞已经明言，过去就有过鼎之出土处并不是原铸鼎处的事例，故将此鼎之出土处视为是周枸邑即豳国之所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况且，美阳在岐山东南，而先秦文献称豳在岐山之北，将美阳释为古之豳国，与史书所记方位不符。许慎此说不为历代学者认同，惟齐思和以该说为是，言：“以豳在渭上（即今武功东北）最可信据，而从无敢从之者。习非成是，积重难返，可慨也已。”^③

第三是汾城（今山西新绛）说。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首先提出此说，认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邠，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④在《国史大纲》中更明言，“窃疑邠在山西汾城，踰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岸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⑤汾城，在今山西新绛。近代史学，好新奇，倡独创。钱穆山西汾城说一出，就为不少治先秦史的学者信奉。考钱穆此说，恐受汉晋人《汉书》注的启发。《汉书·地理

志上》右扶风枸邑县下注有：

应劭曰：“《左氏传》曰‘毕、原、豊、郇，文之昭也’。郇侯、贾伯伐晋是也。”臣瓚曰：“《汲冢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则荀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扶风界也。今河东有荀城，古荀国。”师古曰：“瓚说是也。此枸读与荀同，自别邑耳，非伐晋者。”

按应劭、臣瓚所言之郇或荀，实为二地，颜师古已言明，《通志·氏族略》辨之甚详。其《氏族略二》云：“郇氏，周文王之子封郇侯，或言第十七子。郇国故城在邠州三水东，其后以国为氏。郇音荀，一音环，今有环音之氏，而未闻荀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二十四注：“解县西北有郇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22页言：“郇，地当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不远之地。”则《左传》所述春秋之郇邑在今山西临猗一带。《氏族略三》言：“荀氏，晋之公族也，隰叔之后。荀邑在绛州正平西十五里。荀本侯国，姬姓，晋灭之，以为邑。荀侯之裔，亦以国为氏。”则荀在今山西新绛东北，与郇为另一封邑，在另一地。显然，不能因为春秋时在今晋南有郇城或荀，就断定西周初之郇邑不在今陕西省境。上引汉宣帝时美阳出周鼎，证明此鼎所言郇邑应在关中及其附近，不可能在远至千里之外的晋南。况且，古代地名随封（邑）君迁徙而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在今陕西华县的郑，东周初迁至今河南新郑是一例。《左传》僖

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言文王子十六封国中的毛,“毛公鼎、毛伯敦盖并出扶风,似可推知毛公采邑西周时在扶风,东迁后在洛阳附近”^⑥,也是一例。钱穆以晋南新绛释邠(豳)国地望,无法圆满地解释《诗经·公刘》及《史记·周本纪》所言与豳相关的溷原、隰原、皇涧、百泉、嶧、南岗、漆、沮、渭、梁山、岐等地名,实难成立。

班固去古未远,其豳在西汉栒邑县境的说法为历代经史学者所认同。东汉郑玄《诗·豳谱》笺说:“豳者,后稷之曾孙也公刘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⑦西晋张华《博物志》言:“扶风郿邑豳乡,公刘所都。”^⑧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六说:“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邠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于汉属右扶风郿邑。”

后来,由于地名的演化及认识的差误,《汉书》豳在西汉栒邑县之说,析变出豳在今陕西旬邑县、今陕西彬县以及今甘肃宁县的三种说法。第一今陕西旬邑境说,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邠州云:“豳国城在今州理东北三十九里三水县界,古豳城是也。”第二今陕西彬县境说,其实来自于后代学者的误解。西晋初杜预云:“豳,周之旧国,在新平漆县东北。”《史记集解》引晋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新平郡治漆县,即今陕西彬县,为旬邑的西边邻县。杜、徐二氏之所以称豳在晋朝时漆县的东

北,是因为曹魏至晋初,栒邑县被撤,并入漆县,言豳在漆县东北,实际上还是指汉栒邑县境。而唐《括地志》不加区别,沿袭杜说,称:“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⑨称新平就是汉代的漆县,亦即公刘豳邑之所在,将豳说成在唐朝新平县境,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汉漆县与栒邑为邻县,汉漆县境无豳。只有晋时才并栒邑入漆县,以至将豳亦一起并入。后来有的学者不加考察,以讹传讹,遂有了豳在今陕西彬县的误说。第三今甘肃庆阳市宁县说^⑩,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宁州云:“当夏之衰,公刘邑焉。按今州理城,即公刘邑地也。”唐宁州治定安县,在今甘肃宁县。当代学者多从陕西旬邑或彬县说,有的则笼统地称豳在今陕西彬县、旬邑境,极少赞同甘肃宁县说的。

《汉书·地理志》之豳在西汉右扶风栒邑县的说法无可怀疑。但是,西汉之栒邑县治今何处?豳乡又在西汉栒邑县境的何方位?却是辨析豳国今地的关键问题。

可供分析西汉之栒邑县治方位的早期文献,是《史记·酈商列传》,文云:“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苏犂军于泥阳。赐食邑武成六千户。”在楚汉相争的初期,担任陇西都尉的酈商,先后夺取了北地(治义渠,今甘肃庆阳市宁县北)、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二郡,又在焉氏(今甘肃

泾川东南)、枸邑、泥阳(今甘肃正宁县西南之罗川镇)三地打败了章邯的三位将军,由此赐其食邑武成六千户。古代史书中将领军功的记载多是依据其报告战功的军书而来,而军书记载的军功则往往是按照战役的先后顺序叙述。焉氏、泥阳在北纬 $35^{\circ}20'$ 自西向东一线,在两战中间的枸邑之战的战场当亦大致在同一纬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邠州三水县(旧枸邑)条言:“枸邑故城,在(三水)县东二十五里,即汉枸邑县,属右扶风。”《资治通鉴》卷四十胡三省注引:“宋白曰:三水县东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枸邑故城。”按北魏时改枸邑县名为三水县,其治所一直在今旬邑县城关镇,则汉之枸邑县治在今旬邑县城关镇东北25里(或说30里)处。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将西汉枸邑县治定于今旬邑县东北约20公里之与北地郡泥阳县(治在今甘肃庆阳市宁县西)交界处,即北纬 $35^{\circ}20'$ 线上。查《陕西省地图册》^⑩,旬邑县城关镇向东北至县边界的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为子午岭西延段之山脊,山脊之北今属甘肃省庆阳市之正宁县和宁县。如果我们没有分析错的话,汉代之枸邑县治不在子午岭南麓的今旬邑县马栏镇,就在今甘肃省正宁县后坡、林家坡一带。总之,西汉之枸邑县治所在今陕西旬邑与甘肃正宁两县交界线附近,是为史料所证明了的。

《汉书·地理志》所言之豳乡究竟在西汉枸邑县境内何方位?要考定此,笔者以为

最可依据的是班固之父班彪的《北征赋》。《文选注》引《流别论》介绍该赋写作背景,说:“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此赋是历史学家班彪北行的实录,对考定沿途地名地望,有极高价值。《赋》言: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

这一段说的是,班彪因王莽末造成的社会动乱,无法继续在关中居住,遂离开长安(长都)向西北远游。他早晨从长安出发,傍晚投宿长安北边瓠谷的玄宫(在今陕西泾阳境)。经过云门(即云阳县门,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远望甘泉宫通天台,高耸入云。登上大山又走下山坡,歇息在邠邑的邠乡。在这里班彪联想到先周公刘的遗德,哀叹自己命运的不济。接着前行登上了赤须阪^⑪,终于进入了义渠的旧城(今甘肃宁县北)。

《赋》中班彪在邠乡联想到公刘的遗德,可见此邠乡即先周之豳邑,是我们考证豳之地望的最要紧处,而最早言及豳之地望的《汉书·地理志上》,也是以豳乡认定为先周之豳邑的。就是说,确定了豳乡的位置,公刘所居之豳邑的地望就清楚了。《赋》中明

确说道，公刘之豳的方位，是在甘泉宫的北边，义渠城的东南方，而且先要翻过一个“陵岗”才能到达豳乡。查阅汉代文献，知陵岗不是专有名词，故而在此应是一指代词。《尔雅·释地》言：“大阜曰陵。”《说文解字》卷九下言：“冈，山骨也，从山，网声。”由此，陵岗者，大山之脊也。查陕西省地形，由今淳化县往北至旬邑县马栏镇附近，大体是黄土塬梁沟壑区，并无太大的山梁。而在旬邑县与甘肃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秦直道的这一段却颇为高耸。曾考察过秦直道的王开著文说：“沿子午岭主脉北行……下风子梁过马栏河（又名三水河），即上杨家胡同梁。这座山梁很高，现为旬邑县杨家店林场所在地。由杨家胡同稍转西北不远，即到刘家店子，现为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店子林杨。刘家店子林场位于子午岭正脊……”^⑬则此“陵岗”只能是位于今旬邑县与甘肃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看来，班彪是沿着此道北行，再翻越子午岭，转向西，到达公刘所居之豳国的。由此可以确定的是，西汉之豳乡在汉代枸邑县境内的子午岭之北，今甘肃宁县、正宁县境。

总之，由班彪《北征赋》所记其行踪分析，公刘所居之豳邑地望，在西汉枸邑县北境，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至正宁县一带，并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辖境内。《三辅黄图》卷一云：“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枸邑、义渠十县，属京尉大夫，府居故长安寺。”此言王莽时曾将枸邑、

义渠皆隶三辅下之京尉大夫所辖，即今陕西旬邑县与甘肃正宁、宁县其时皆属一尉郡，并非绝然。

东汉大儒郑玄说到豳的具体方位。在《诗经·大雅·豳》答张逸问笺语中说：“豳地今为枸邑县，在广山北、沮水西，有泾水从此西南行，正东乃得周，故言东西。”还言：“岐山在长安西北四百里，豳又有（或云作“在”）岐山西北四百里。”^⑭广山也不是专有名词，应为群山之意，就豳地而言，当指子午岭。沮水，为洛水支流，源于陕西黄陵县与甘肃宁县交界的子午岭东侧。泾水源于六盘山东侧，东流经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安定（今甘肃泾川），在今甘肃宁县南与泥水（今马莲河）汇合后西南流入今陕西彬县。则郑玄所言，豳邑的方位在子午岭西和北（该岭在今甘肃正宁县与陕西旬邑县交界一带呈北南、东西走向），泾水由西东流转向西南流之转角处附近，即今甘肃宁县南境，就是古豳邑所在。又以郑玄所云岐山东至长安、北至豳的距离（此四百里当是以路程计，与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差别甚大）计算，在今地图上测量岐山县城东至西安、北至甘肃宁县的直线距离正好相当，证明郑玄所言不虚，豳邑在今甘肃宁县境。

豳邑在今甘肃宁县在汉唐间是学者和皇朝的共识，并因之在今甘肃庆阳市境设置以豳命名的行政区域。《魏书·地形志下》言：“豳州，皇兴二年（468）为华州，延兴二年（472）为三县镇，太和十一年（487）改为

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看来，班彪是沿着直道北行，再翻越子午岭，转向西，到达公刘所居之豳国的。由此可以确定的是，西汉之豳乡在汉代枸邑县境内的子午岭之北，今甘肃宁县、正宁县境。班固《汉书·地理志》：“后魏置豳州，西魏改为宁州。大业初夏曰豳州。……新平，旧曰白土，西魏置豳州。开皇四年（584）改县为新平，大业初州废。”元初史家胡三省考订了北魏豳州设置的沿革，言：“皇兴二年，置华州于北地，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豳州，领北地、赵兴、襄乐郡。”^⑤北魏及隋大业初两设的豳州，治今甘肃宁县，盖因此地古有豳国。而西魏在新平（今陕西彬县）所设豳州，后称南豳州。相对于此，以治今宁县之豳州称为北豳州。近年，在宁县县医院工地发现巨碑一方，碑额题：“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颂”。铭文有：“大代正始元年（504）岁在甲申，七月丙午朔，十五日庚申……持节都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率州府纲佐，仰为孝文皇帝立追献寺三级”云云。^⑥该碑为北魏豳州治在今甘肃宁县之物证。隋唐之际的陆德明言：“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邠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汉属右扶风郿县。”^⑦原隰之野，即周之大原，今甘肃庆阳市境的董志塬，该塬是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一块塬面，面积达910平方公里。宁县在董志塬东南境。

故陆德明亦以为豳在今庆阳市境，不在今陕西旬邑。

豳为公刘之豳国的本字。但因豳与邠通用，故亦有以邠代豳者。唐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以‘豳’字与‘幽’字相涉，诏曰：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辩惑，必也正名。改‘豳’字为‘邠’。”^⑧从此，人们多以邠替豳，导致二字更难区分。

以上据历史文献考证，不窋、公刘活动之豳地，在今甘肃庆阳市董志塬上，而公刘所居之豳邑，则在今（董志塬南境的）宁县境，西汉时属枸邑县。但唐颜师古（581—645）注释《汉书·地理志下》“公刘处豳”句时，将班固原话照搬至唐，言：“即今豳州枸邑。”从而在不经意间犯了大错误。第一，唐朝并无枸邑县，北魏时已改枸邑为三水县。第二，唐时三水县治与西汉枸邑县治不在一处，三水县治在东汉枸邑县治西南二十五里。第三，三水县疆域比起西汉枸邑已大大缩小，古豳邑不再为唐三水县属境。所以公刘之豳邑虽属西汉之枸邑，却绝不等于在唐之三水县（枸邑）境，何况唐并无枸邑县名。颜师古《汉书注》影响极大，其说为历代学者征引，而唐以后旬邑县治及其疆域并无大的变化，人们却随颜师古误以古之豳国在今之陕西旬邑县了。

颜氏的误说，迄今未见有学者挑明。但历代甘肃庆阳地方的官员、学者却从来没有忘记本地曾是周文明兴起之地的光辉历史，每当朝廷征集地方图志时，庆阳地方官员都

要将本地的先周历史遗迹详细上报，而为历代全国一统志所采用，从而保存了邕在甘肃庆阳市境的真史。地方志如，明《嘉靖庆阳府志》卷一^①《建置沿革》称，“庆阳乃古唐虞雍州之域，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宁州（今宁县），本公刘故属邑”卷十七《古迹》称：“不窋城，即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公刘邑，在（宁）州治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卷十七《陵墓》，“不窋墓，在府城东三里许岷畔。碑刻剥落，上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殿宇基址犹存。嘉靖十九年，御史周南，知府何岩，立碑表墓。”全国一统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在宁州彭原县（治今宁县西北）条下言：“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国，其后戎翟攻太王，亶父避于岐山而作周。按今州理城（治定安县，即今宁县城），即公刘邑也。在庆州顺化县（今庆阳市庆城县）条下言：“《周本纪》曰，夏氏政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今州理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是也。”^②《太平寰宇记》在卷三十三庆州条下言：“夏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今州理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在卷三十四宁州条下言：“公刘邑也。”《明一统志》卷三十六言：“旧志，庆州，不窋、公刘所居之地。”庆阳府建置言“周之先不窋所居，号北邕。”宁州条下言：“本公刘邑。”祠庙有“不窋庙，在（庆阳）府城内。不窋，后稷子，周先祖也。庙有塑像，东西两壁绘文

王以下三十七王像。”“公刘庙，在廉城西南八十里。公刘，后稷之曾孙，有宋守王庶所撰碑。”其陵墓有“不窋冢，在府城东三里，碑久剥落，上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古迹有“不窋城，在府境内，夏政衰，后稷子不窋奔戎翟之间，建邑而居，即此城。”清《嘉庆一统志》卷二百六十二，庆阳府古迹有“公刘庄，在安化县北三十里，其地有腴田数亩，号天子掌，人不敢垦，相传为公刘庄。”其陵墓有“夏，不窋墓，在府城东三里。”祠庙有“不窋庙，在安化县南”，“公刘庙，在安化县西南八十里”。可以说，甘肃庆阳地区的官员、学者古往今来，都没有承认过所谓“邕在今旬邑”的误说。

现代考古资料为先周邕国在今甘肃庆阳市境提供了佐证。周先祖不窋至古公亶父十余代的居住中心在子午岭西麓今庆城、合水至宁县一线，时间大体为三百多年，约为公元前1500至前1150年间。庆阳市境考古文化分期基本明晰，先是仰韶文化，后是齐家文化，接着是寺洼文化和周文化。1984年，甘肃省、地、县文物部门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合水县蒿铺乡石桥村九站遗址区域内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属于寺洼文化，在寺洼文化层的上部叠压着早周文化层。在清理的八十座寺洼文化土坑竖穴墓葬中，出土了近千件陶器和一件铜刀、一件铜饰。此处出土的陶器原料粗糙，器壁钝厚，质地较松散，器表呈橙黄色。典型器物为马鞍形口橙陶双耳

罐。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3370±110年^⑨。这个年代与周先祖在庆阳生活的时代大体同时，应断定为先周文化遗迹。九站文化出土的马鞍形口橙陶双耳罐，近二十年，在庆城县东山周祖陵、宁县庙咀坪等地都有出土，证明三县的先周文化一脉相承，时间相近，都是周先祖生活过的遗留物。

注释：

① 豳字，在历代文献中或写作邠，旬邑，或写作枸邑、娜邑；本文一仍其旧，以加区别。

②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③ 《西周地理考》，载《燕京学报》，1946（30）。

④ 《燕京学报》，1931（10）。

⑤ 《国史大纲》，上册，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⑥ 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注》，4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⑦ 《毛诗注疏·豳七月诂训传》，载《十三经注疏》，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⑧ 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所引。

⑨ 《史记正义》引。

⑩ 近年，甘肃撤地建市，原庆阳地区改称庆阳市，原庆阳县改称庆城县，原西峰市政称区。本文所言即依新地名。

⑪ 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

⑫ 《文选》李善注：“赤须坂在北地郡。《水经注》曰：‘赤须水出赤须谷，西南流注罗水。’”是知赤须阪应在今甘肃宁县境内。

⑬ 《秦直道新探》，刊于《西北史地》，1987（2）。

⑭ 《毛诗注疏·绵篇疏》，载《十三经注疏》，5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⑮ 宁县博物馆于祖培同志提供该碑照片。

⑯ 《经典释文》卷六，四部丛刊本。

⑰ 《唐会要》卷七十“邠州”，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⑱ 明傅学礼撰：《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整理点校本。

⑲ 《元和郡县图志》，66~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⑳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㉑ 本文原系为于俊德、于祖培所著《先周历史文化新探》一书所撰序言的一部分，该书于2005年11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兰州大学教授）

从“史‘志’”到“方‘志’”

潘捷军

摘 要：在中国史志发展史上，“史”与“志”历来关系密切，同时又有重大区别。而且在我国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仍属于史学范畴。由于“作志必有所法《史记》《汉书》”历来是史志界的共识，因而认真考察梳理方志从《史记》之“书”、《汉书》之“志”的初始融合状态，再到方志基本定型后史、志逐步分立直至完善的全过程，即如何从史中之“志”发展为完整的“方志”形态，对史志学科建设特别对方志编修实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史记》 《汉书》 史志关系 历史分析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在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始终属于史学体系中的一个三级学科。而史志关系历来也是史志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似乎又是一个始终未予理清的难题，正如有学者所言：“方志与历史的关系最纠结。”^[1]例如，仅《辞海》对“志”就有两种不同解释^[2]：

——“纪传体史书的组成部分。自班固《汉书》改《史记》八书为十志，专记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艺文经籍等以来，为历代纪传体史书沿用并有所变化。”这显然是侧重于“史”的分析。

——“地理方域类史书书名，如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县志以及都邑志、山水志等。”这显然是侧重于“志”的另一种分析。而且即便侧重于“志”，但仍视其为“史书”。

上述各侧重于“史”或“志”的不同解释，实际既反映了两者不同的丰富内涵和外延范畴，同时又可见相互间的关联程度。谭其骧曾指出：“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3]可见，两者既不可简单地“合二为一”，但有时又难以截然“一分为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

研究多侧重于对方志多重来源的探析,而忽视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因此不仅要溯“源”,也要析“流”,即要力求梳理“志”与“史”从初始期的“合二为一”到其后逐渐“一分为二”一步一步的演变过程,以从中疏通方志发展脉络,厘清史志关系,探寻方志发展的本质规律。

一、《史记》八“书”与《汉书》之“志”对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早在明代就有“作志必有所法《史记》也、《汉书》也”之说,这也历来是史志界的共识。如谭其骧等学者便认为:“地方志的渊源确乎可以追溯到汉朝……这就是方志滥觞。”^[4]“自司马子长以八书立法,班固广之为十志。志之名所由昉,志之类所由分乎。”^[5]以至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上承《史》《汉》的余绪”,“方志体例大致由《史记》《汉书》演变而来。”^[6]因而《史记》、《汉书》不仅对中国史学史具有奠基性意义,同样也对中国方志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史记》八“书”对方志发展史的开创性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文献体裁,“志”其实源于《史记》,但在《史记》中并未直接称其为“志”而是“书”,“书”因而一度也是“古代史书的通称”。^[7]正如有学者所言:“志之体裁始于《史记》,然司马迁谓之曰书,以下各史多谓之志矣。……论其名称,大体则名同者内容相近,亦有名同而内容渐更改者。”^[8]又如刘知幾在《史通·书志》中所举:“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

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三千年的历史。它共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书和表等五种基本体裁,其中12篇“本纪”为介绍全书主旨的法则纲要,30篇“世家”记载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70篇“列传”是将相大臣和王公贵族的传记,10篇“表”则是以表格形式对年爵、人物、事件按一定顺序的记录,另有8篇则为“书”的形式。《史记》因以帝王等人物为主线,因而创纪传体史书先例。《汉书·刑法志》中有过结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八“书”以事为类,集中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史事及发展过程,具有专史性质,显然与后世以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为主旨的方志有相同之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方志对前人成果的有益借鉴。但如何对“八书”进行分类和定性,历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认识:一是认为其主要记载了典章制度。正如章学诚所言:“马迁八书,皆综核典章,发明大旨者也。”^[9]还有一种研究认为:“书,通常都笼统地将其说成是记载典章制度,这又是将后人的理解加给《史记》的说法。……礼乐、律历等,在《汉书》以后的‘正史’中侧重于制度方面的内容,而在司马迁并不是要写‘制度’。至于‘山川,鬼神’等,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类到‘制度’中来。”^[10]事实上,从司马迁“礼乐损益,律

历改益，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的创作意图看，自然等内容无疑也是其记载的重要对象。唐代司马贞据此认为：《史记》中的“八书是‘法天时之八节’”。所谓“天时八节”，在古代是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八个节气。尽管对这种认识学界有牵强附会之说，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史记》之“书”并不仅仅记载典章制度，同时也大量记载了自然环境的状况与变化。从方志发展史和志书形式变化过程看，志书被视为“地理书”始终是史志界的一种重要倾向^[11]，而且在方志定型之前，“图志”一度也是其另一种重要形式。如梁启超所言：“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其实不论是地理书还是图志，记述自然都是古代志书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关注社会和注重记述人文等内容则是后来特别是近现代才逐渐出现的一种变化，因而从一个侧面可见《史记》对方志初创时期的重要影响。

还要注意的，其实不仅是“书”一种形式，包括“传”“表”等形式同样为后人编纂方志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启发借鉴，即“《史记》的体例纪、表、书、传也为历代修志者沿袭仿效。”^[12]从而对后世方志的记述内容和编纂方式等因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汉书》之“志”对方志发展史的引导性价值

东汉班固所著多达100卷的《汉书》，

系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诚然，司马迁与《史记》、班固与《汉书》，均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高峰，但两者又确有不同之处。有学者大家便毫不掩饰，如梁启超便有“《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的评价。^[13]柴德赓也认为：“《汉书》的‘志’比之《史记》八‘书’，有极大进步。”^[14]刘节甚至还认为“《汉书》十志，远远超过司马迁。”^[15]等等。其实这未必都是司马迁的不足，相当程度上则是后者在借鉴前者基础上的发展进步。从史志关系特别是方志从“史”到“志”的发展过程看，《汉书》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从外在形式看，首先是基本沿用了《史记》体裁。“《汉书》虽然变《史记》的通史格局为专记西汉一代的断代史体制，但却沿用了《史记》的纪、表、书、列传互相配合的体裁”。^[16]而且历史上早已有人“注意到《汉书》十志与《史记》八书间的因袭关系”，如赵翼云：“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17]从中可见两者一脉相承的相互联系。从方志发展史看，尽管后世方志内容、体例等与古代史书相比变化较大，

然而“表”“传”等一些基本的体裁形式却一直得以传承延用。其实，与传承相比，更重要的是在于创新，特别是《汉书》将“书”改为“志”，使“书志体”在中国史学史上得以创立。当然取此之名也有避免与《汉书》之名重复之意，如刘知幾在《史通·题目》中所言：“改书为志，意在互文”，但一字之改意义非凡，客观上对后世方志的编纂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如梁启超曾指出：“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建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18]当代也有学者认为：“《汉书·地理志》是史、地、志三合一之作，是一部最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首先要承认它是史。再次要承认它是方志的一种——地志。”^[19]

——从涉及内容看，《汉书》内容更为博赡。即“就内容来说，《汉书》的‘志’比《史记》的‘书’更为系统而外，还有所发展。如食货、刑法、地理等志，皆班氏所创。”^[20]《后汉书》作者范曄曾有“博赡不可及之”之评价。白寿彝则更为直接：“司马迁开创了书志体并写出光辉篇章，却很不完整，相对说完整的是《汉书》。十志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学问，包含了理论，也包含了技术。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都写进十志了，从而为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等五支学科，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21]刘知幾在《史通·二体》中论及“志”以总括遗漏等情况时也曾指出：“逮以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长也。”并

进而对《汉书》还有“言皆精炼，事甚该密”和“自古迄今，无改斯道”等一系列评价。鉴于《汉书》本身的地位，这种内容框架对后世史志编纂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方志与史书等其他形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就记述内容看，方志比其他形式涉及面更广，内容更为丰富。事实上也正是由此开始，后世志书的记述内容不断扩展丰富，并得以传承延续。

——从编纂方式看，有分析认为：由于“《史记》的巨大成功又造成一种普遍的思想定势：只有《史记》这种上下贯通的写法，才是著史的唯一格局，至于还有其他什么著史体制再没有人去探求了。这样，就造成撰史工作始终笼罩在司马迁巨大身影之下，无法走出。”^[22]这一局面在《汉书》得到改观。客观上东汉统治者与前代不同，他们既需像《史记》那样追溯总结历史，但鉴于相对稳定的现状，更需“总括一代”面对现实。因而与《史记》的“通史”形式不同，《汉书》另辟蹊径，以“断代史”的“横列门类”而见长。同时正因其为断代史，所以更注重横截面，相应门类内容也更丰富，如除帝纪论述西汉一代政治史之外，其他的表、志均以横述方式，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水利、食货、刑制、兵制、学术等等各方面。而且《汉书》形式上虽为断代史，但著者意识并未“中断”，相应著作中也体现了鲜明的“通史”意识。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所言：“迁固而下，断代为书，……史籍标‘通’，此滥觞也。”

班固自称其书秉持“函雅故，通古今”之理念而“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同样全书中所贯穿的这一理念清晰可见。“如果说《汉书》十志沿袭了《史记》八书，那么所沿袭的是《史记》的通史精神；如果说它还有所创新，那么其所创新也在其通史精神。”^[23]这样，班固“有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断汉为史’，在内容上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上则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学从司马迁巨大身影的笼罩下走出来，向前跨进了一大步。”^[24]

在此意义上将《史记》和《汉书》结合起来看，正如章学诚所言：“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25]，因而它们对方志编纂的导向性意义在于：由于“横排门类”“横不缺项”和“纵述史实”“纵不断线”是志书最基本、最重要的编纂原则，横陈百科、纵述历史也是方志特别是区域性志书最典型的标志。以此来看《史记》《汉书》，《史记》相对侧重于“通变化”的“纵述”，而《汉书》则无疑相对着眼于“守绳墨”的“横陈”，因此正是这两者的“纵”“横”结合，创立了中国史书编纂的基本范例，对后世方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编纂原则与总体框架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和引领价值。

（三）《史记》《汉书》中其他体裁形式对方志发展的影响

“《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对以‘志’为主体的方志的影响是世所公认的。”^[26]但在强调《史记》之

“书”、《汉书》之“志”对方志编纂重大影响的同时，还要承认，在“书”“志”这支主脉之外，《史记》和《汉书》中其他有关体裁同样对后世方志编纂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李兆洛早就认为：“传、志、图、表，文家之例，非史专名，此法不具，不可以载事”，并强调修志“当仿史例”。^[27]傅振伦也曾明确指出：方志体例“绝大多数本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本纪、书志、表历、列传，而增加了图。后来志书愈多而体例各异。”^[28]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旧方志的体例，绝大多数都沿袭纪、表、书、传。用本纪记载大事，用书志体记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类情况。用表格序列族辈，以续家谱。用列传体记载人物，并辅以图谱、汇而成编。”^[29]因此在分析《史记》《汉书》对方志的影响时，也不可忽略上述因素。

如章学诚“三书体”所言之“志”即包括纪、图、表、考、传等多种形式，相应其所纂《永清县志》也以纪、表、图、书、略、传等体裁统领全志，其篇目为^[30]：

纪二：皇言纲第一 恩泽纪第二

表三：职官表第一 选举表第二 士族表第三

图三：舆地图第一 建置图第二 水道图第三

书六：吏书第一 户书第二 礼书第三 兵书第四 刑书第五 工书第六 政略一（不分目）

列传十：列传第一至第六 义门列传第

七 列女列传第八 阙访列传第九 前志列传第十

同时还要看到, 尽管《史记》《汉书》从不同角度分别记载了各时期大量的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现象, 但还毕竟不能将《史记》之“书”和《汉书》之“志”与方志完全划等号。客观上方志当时正处于初创期, 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从数量比重看, 方志均未成气候, 更未定型, 即使以“志”命名的大多也不是方志, 仍是史书。正如梁启超所言: “方志的发展过程是由单一而多样, 由简单到复杂。”事实上也正是《汉书》之“志”出现后, 才为这种探索增加了砝码, 校准并确立了发展轨迹。另外, 承认《史记》之“书”和《汉书》之“志”与方志的历史渊源关系, 并不意味着两者便是方志的唯一来源。事实上在中国方志史千百年发展过程中, 恰如涓涓细流汇成海, 层林尽聚连成峰, 科学规范方志的最终形成, 是各种典籍文献形式有益借鉴的结晶, 而非仅仅一种或少数形式。当然在这些众多形式中, 《史记》之“书”和《汉书》之“志”无疑应为主流, 因而也对规范志书的形成和方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史汉”之后方志从“史”到“志”的发展过程

既然承认《史记》《汉书》相当程度上对方志的开创性意义, 那么“史汉”之后, 同样从方志角度看, 这支“脉”又是如何产生影响并传承延续下来的? 有分析认为: “两千多年来, 方志的体例曾经有过几次较

为巨大的改革。大要是在记人和记地两方面有过若干参差。两汉时期, 记人和记地的泾渭分明, 各自成书。其后逐渐互相羸入, 区分亦不甚明晰。到宋代随着地方经济, 特别是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 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综合性的地方记录, 于是方志逐渐增加了社会、历史内容, 形成了‘史志体’内容, 从两宋时起, 方志兼记人地两方面的流风余韵, 历年弥久”。^[31]

(一) “史汉”之后的“史”中之“志”

有统计分析认为: 《汉书》“以后的史书, 志或增或减, 共计有《礼志》《乐志》《律历志》《天文志》《祭祀志》《河渠志》《食货志》《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百官志》《舆服志》《祥瑞志》《仪卫志》《选举志》《释老志》《兵志》等十八种。各史称谓上稍有不同, 分合上也不一致, 主要是《礼志》《乐志》有时合称《礼乐志》, 《律历志》有时分为《律志》和《历志》, 《祭祀志》有时称为《郊祀志》, 《河渠书》有时称《沟渠书》, 《艺文志》或称《经籍志》等。”以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为例, 二十四史中, 无“志”的共有七史, 即: 《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和《北史》。但其相关内容并未就此缺失, 有的体现在注释、补志中, 有的则体现在其他正史中。例如: 《三国志》无“志”的缺陷在《晋书》中得到弥补; 《梁书》《陈书》《北齐书》和《周书》等相关内容体现在《隋书》的“十志”中, 连同《隋书》以“合志”形式并称为“五代史

志”；同样，因《南史》《北史》无志，《宋书》八志、《南齐书》八志、《魏书》十志和《隋书》十志合并起来，正好补全南北朝的全部内容。^[32]除上述二十四史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史志类著作，如《三国志》《五代史志》《九国志》《齐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流寇志》《平寇志》《通志》《续通志》《清通志》《海国图志》等等，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作详析。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史志关系和判断各种史志类文献的性质时，不能望文生义，即不可将凡带有“志”字者文献一概轻易归入方志范畴，需要认真梳理辨析。“看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方志，要先看其内容和著作体例，而不能用名称来定其是与不是”。^[3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此与方志没有丝毫联系。事实上，无论是记载内容还是编纂体例，它们都为各时期的方志编纂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相互间关系十分密切，甚至也有学者将上述个别文献直接视为方志。

以郑樵与《通志》为例：《通志》虽未列入“正史”行列而为“别史”，但它却是纪传体通史的代表作。在方志学中，“通志”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专指贯通古今的省志；二是有别于断代续志，专指纵贯通古今、横陈百科的各级区域类志书。^[34]但在史学领域以至通常的辞典类书籍中，对“通志”几乎又有截然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阐释基本又以郑樵的《通志》为依据。例如：“通志：书名，南宋郑樵撰。二百卷。纪传体通史。”^[35]“通志：书名，南宋郑樵撰。

二百卷。为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通史的代表。”^[36]等等。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晚年郑樵在总结其三十多年读书、研究和撰著过程时曾回顾：其有相当精力放在天文地理及其他有关学科上，相应成果有《春秋地名》《春秋列传图》《诗名物志》《图书志》等，当时尚未完成的还有《天文志》《郡县沿革志》《动植志》《氏族志》等等。仅从其经历和成果就可看出郑樵与方志研究与编著间的某种联系，这在郑樵本人来说也许是无心之举，但对方志界而言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章学诚视《通志》为“统前史之书志”，“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正是郑樵及《通志》对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所在。

（二）从“合二为一”到“一分为二”

自“史汉”以后，“志与史同源，史与志异流”（〔明〕张元益）的趋势逐步显现。但历来又有“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之说，它既反映了史志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方志编修的艰难程度。

《史记》《汉书》之后，两者对中国方志史发展的影响开始显现并得以传承延续。如从唐太宗时期所修《晋书》“十志”（《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食货志》等）中可见其与《汉书》间的承继关系。从高宗显庆元年所撰成的《隋书志》中的天文、律历、五行、食货、刑法、地理、经籍等卷中，也因其“有的甚至继《汉书》十志讲

起”，^[37]因而同样可见其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特别因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很高，因而也被视为唐修五代史中最好的一部。正如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所言：“《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司马）迁、（班）固以来，皆不及也。”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括地志》借鉴《汉书·地理志》所创立的新体裁，《元和郡县志》因系现存最早全国总志而在方志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等。但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毕竟属过渡期，即在宋朝方志尚未定型之前的一些文献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方志。有时即便是同一本文献，史志学界也会有不同认识，所谓“‘史’者见史，‘志’者见志”。对此，谭其骧曾指出：“现在有不少人把这几种流传到今天的汉晋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几种书的内容显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38]事实上很多文献虽具有方志雏形，却非严格意义上的志书，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妄加断论，其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毕竟仍属于宋代。

所谓“方志定型，指的是方志作为一种体裁的总体，得到学界的广泛认识、肯定和推广应用，这是一个具有数量和质量上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意味着此后的方志编纂，从自为到自觉的转变，有了更为明显的史志区别，更为明确和广为遵行的体例规范，并在这一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下去。”同时也“正是由于方志定型，史志才有了明显界限。”^[39]“宋以前的方志，常详于地理而略

于人文，主要记载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土地物产，人口税赋等等，内容不出地理书范围。到了宋代，方志除了记载同于前代志书内容外，特详于人文历史方面，……自此以后，体例相沿。体例为之一变，方志走向定型，并直接影响后代方志。”^[40]因此，尽管以“史汉”为始，方志经历了从“史”到“志”漫长的渐进过程，期间也曾出现了一些具有方志形态的史著文献，但真正产生决定性作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乃为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宋志上承《史》《汉》余绪，下为后来方志编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汉以来修史者无不奉《史》《汉》为圭臬，那末，宋以来修志者几乎莫不以宋志为楷式了。”^[41]当时志书的代表作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等。历来史志学界之所以将宋代视为方志定型时期，有以下几个重要标志：

一是记述内容较之以往更为丰富，相应的门类框架更为博赡。如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序》指出：“举凡輿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42]

二是体裁形式更趋多样。“宋代方志的定型，不仅反映在名称的变化，逐渐趋附于统一而称志，而且还体现在内容的不断充实和体例的逐渐完善上面。”^[43]如南宋周应合修《景定建康志》时，已有“志”“传”

“图”“表”“录”及“拾遗”等多种体裁，这不仅与《史记》《汉书》体裁形式已大相径庭，与之后的志书等史志类文献也已有明显发展，即便与当今志书“述”“记”“志”“传”“图”“表”“录”和“索引”等八种体裁也已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宋代志书定型对后世方志事业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三是一些重要的编纂原则已渐趋明晰。如《玉峰志》（今江苏昆山）“凡例”言明：“凡事旧在昆山，而今在嘉定者，以今不逮本邑，今皆不载。”“凡事有重见者，止载一处，余书见某门，更不重载。”还有人提出“远者谨严而简，近者周密而详”^[44]，等等，这显然都是方志“越境不书”“详今略古”等编纂原则的雏形，也是妥善处理交叉重复关系的最早范例。

宋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对中国方志发展史意义重大，关键在于，它使“史”与“志”由原来的“合二为一”开始“一分为二”，至此以后，两者既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并各树一帜，如方志记述的内容范围渐趋丰富广泛，体例框架较为规范合理，形式手段逐步完备完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罗列了汉代后“分地记载之著作”种类（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谱牒、文征）后指出：“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45]与此同时，史志关系也并未完全“分道扬镳”，而是仍然十分密切。而且这种关系与原有复杂状态已有不同，即在各有侧重所长的基础上逐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势。当然，这种过程同样是

渐进性的，甚至时而复杂，时有反复。例如，元代方志大多仍被纳入史书行列，史志同义，在当时也是常谈之论。从中可见两者关系之密切。^[46]而至明代《大明一统志》，则已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廓镇市，土产，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记述内容范围，不但比以前史志内容已有较大不同，同时较之《大元大一统志》也更为系统规范。^[47]

及至清代尤其是中后期，方志事业发展已达到鼎盛期。一方面，当时志书编纂仍注重继承传统。如雍正九年始纂、乾隆元年成书的《江南通志》，体例基本以史载编排，门类分为舆地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等十志，在其《凡例》中还特别申明了其“志与史相表里”的编纂主旨。另一方面，当时无论是编纂理念还是修志实践都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如当时记述内容的认识便已扩展为：“志也者，志之天文，志之地理，志人事之成败，志世数之沿革，下及一民、一物、一草木、昆虫、鸟兽、鱼鳖，纤细必志。”^[48]梁启超曾说过：“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编纂之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49]特别当时有的志书记述对象已开始突破皇家修史的传统桎梏，不再局限于地理等偏门和统治者政绩，涉及范围更广，更切合社会变化实际，同时也更符合方志不

同于史书等其他形式的特有的编纂规律。

梳理上述变化,不能不论及章学诚的特殊贡献。“方志虽然源远流长,但在明以前诸史艺文志和诸家书目中皆与其他地理著作并列于一门类,未予区别。……自章学诚著《方志略例》,倡方志之学,‘方志’一称,渐为世所常用。”^[50]需要关注的是,章学诚无疑在史、志两个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正因如此,他既深谙两者各自不同的特点规律,又积极致力于两者关系的探索。一方面,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志乃史体”说,“史属信史”等也确是其就方志性质所强调过的问题。暂且不论其中不乏因其与戴震等考据派(纂辑派)激烈论争而导致的矫枉过正,客观上看,他的理论确有一定的局限偏颇。如在史志关系上,晚清王棻就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其大弊在欲仿史。”等等。不过还需要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在史志关系问题上,章学诚也曾明确提出“志”与“史”当需“严名分”。如方志既需与史有所关联,又应“避僭史之嫌”;“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之体当详于史”,“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等等。他还在两者体例上作了变革创新,构建了“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的总体框架,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三书”“四体”说,等等。因此总体上说,章学诚走出了略显艰难但又是关键性的一步,这也是方志自南宋定型后又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可以说,没有章学诚的系统创见就没有后世的方志学理论和志书成果。“章氏的

重大贡献在于,在建立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参照史学理论建立了方志学理论体系。章氏提出了以史入志的想法,用史学理论要求方志编纂,这是一大进步,可惜没有完成转型。”^[51]笔者以为,恰恰是章学诚的“志属史说”奠定了史志关系基础。即他既坚持“志”属于“史”,且特别强调“本非地理专门”,同时又用一系列论述和修志实践证明“志”不同于“史”更不等于“史”,从而阐明了史志间的相互关系,确立了方志学在史学总体框架体系中的地位,这是章学诚对史学和方志学的一大贡献,而且为学界尊崇至今。

民国时期方志界的转型探索首先源于“新史学”的影响以至冲击。以“国史重写”运动为标志,“‘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其“根本性的整体重建,即推倒以封建皇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52]“新史学”无疑对方志编纂和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傅振伦在《修志刍议》中就曾指出:“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专详沿革地輿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

在对史志关系的认识上,一方面,民国史志学界基本继承了章学诚的史志观,如瞿宣颖认为“方志者,地方之史也”。^[53]李泰棻认为“方志者,即地方之志,盖以区别国

史也，在中央谓之史，在地方谓之志，故志史即史”^[54]，等等。另一方面，民国学者也并不完全认同章学诚的传统陈见，而是有所不同，有所创新。如黎锦熙便提出“史地两性，兼而有之”和“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的主张。^[55]梁启超《龙游县志·序》则进一步提出“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的主张。王棻在《重修台州府志议》中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志虽史之支流，而其体实与史异”的观点，等等。这些理念主张既直接影响了当时志书的编纂，客观上又为方志既属于史学体系又不完全等于史学的学科最终定位奠定了基础。史志关系的这种理念也直接影响到方志编纂实践。如在志书总体框架上，顾颉刚明确指出：以往“历史的研究，偏重纵的方面，横的方面几乎没有注意到”，而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用‘横’的叙述方式而写作的史书”，但如过于“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56]这显然既是对前人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为后来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等编纂原则的创立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新时期史志关系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方志体例的不断变革，方志现象性定义地理书、历史书、史地两性、政书、地方百科全书、地情书等说均在不同时期流行并发挥作用。1989年全国学术年会之后，地理书、政书等现象性定义已失去生命力，那些有生命力的现象性定义依然得到继承”。^[57]其中史志关系再

度引起关注，并一直延续至今。值得关注的是，新时期史志关系的转折点相当程度仍源于史学自身的变化及对方志学等所属相关学科的影响。

正如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曾明确指出的：“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58]事实上，“‘五四’以后，史学走向专业化，专题论文或专著取代综合性叙事成为主流，……问题成为史家的关注中心，而确定问题、收集证据、展开论证、得出结论，成为一般史家的固定研究程序，有观点、有考证、有解释、有注释的‘分析式’写作方法即所谓学术规范亦渐次形成，历史叙事（‘讲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科学史学的对立物”。相应带来的结果是：“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以历史编纂为主流，那么现代史学的重心无疑是历史研究，相应地，如果将叙事视为传统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么现代史学的发展方向则显然是对叙事的疏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史学专题化，以史料审查为依据的史学精细化，以哲学探索为目标的史学规律化，以学科互涉为方法的史学多元化，等等，不仅在昭示着这一趋向，而且使得现代历史叙事在整体风格上与传统历史叙事大相径庭。其中，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发生了从描述到分析的话语转向。”^[59]如果认同史学界的这一分析和自我评价，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史志从“合二为一”向“一分为二”的重要转折期，从而使史志研究得以从各自不同角度来重新审视学科发展，特别是客观上为方志

独立发展腾出了空间，搭建了平台。

注重遵循传统仍是新时期史志界认识和处理史志关系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即便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方志界尊重历史的传统始终未予放弃。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傅振伦在肯定以往方志体例“绝大多数本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本纪、书志、表历、列传，而增加了图。后来志书愈多而体例各异”之后，还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以为方志体裁基本可分为纪（编年与纪事本末两体相结合）、考、传，而以图表分见各篇”的具体主张。^[60]由此可见《史记》《汉书》对新时期方志编纂事业的影响程度。

当然，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在史志关系研究上同样如此。如谭其骧就曾尖锐批评章学诚的传统史志观是“迂阔之谈，并不可取”。^[61]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在史志关系问题上，仓修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并逐渐成为史志学界共识：“地方志不等于地方史，更不同于历史地理。总的来说，它虽然具有地方史的性质，但内容却比地方史来得丰富，记载的面远比地方史来得广阔，而地方史的内容又比它来得专与深，两者虽有相同之处，却并不等同。因此，地方史既不能代替地方志，地方志也代替不了地方史。方志就是方志，有它自己的特性，决不能以地方史的尺度来要求，否则编写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地方志。”“时至今日，当方志已经称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时候，他（注：章学诚）的有些说法显然就不合时宜了，特

别是方志就是地方史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就不太确切，尽管方志仍具有地方史的性质，属于史的范畴，但决不能说是地方史。”^[62]受此启发，笔者曾以独特的“工”字图为例解释史志关系，即把图中的“⊥”形结构视为“方志编纂”，而把上面的“一”视为“历史研究”，说明方志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则是在方志编纂基础上的深化，以此形象阐明两者“志为史基”、“史从志出”和“志者史之积，史者志之成”的辩证关系。^[6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改革开放两轮修志实践的探索，在史志关系研究上，不仅是过去一些明显的谬误，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第一轮修志工作刚起步时，一些学术大家的意见经过实践检验也有了新的认识和定论。例如谭其骧曾说过：“史以记载过去为主，志则以记载现在为主”，这与2006年国务院所颁《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方志须记述“历史与现状”的要求显然已有明显不同。又如朱士嘉曾说过：“史往往有褒有贬，方志一般有褒无贬。”傅振伦也说过：“史记善恶，志重表扬”等等，显然这与现志书普遍遵循的“述而不论”的客观原则和实际所看到的志书也已大不相同。对此不必苛求前人，这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

还要看到的是，新时期的志书编修实践也大大助推了史志关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以20年为一轮，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两轮大规模的修志工作，目前正处于第

二轮修志工作的最后攻坚阶段。“方志在宋代‘定型’之后，其内容（门类）与体例并非从此一成不变，而是从体例结构、记述内容、文字繁简到使用语言，都不断有所变化，其变化反映了方志体裁的日趋成熟与独特，越来越体现方志与其他体裁（包括其他门类的史书）的区分。”^[64]就两轮修志实践所出版的大量新志来看，无论是体例形式还是所记述内容，志书不仅与传统史著相比已大相径庭，即使与旧志相比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当说，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史志关系的研究引领。

总之，“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65]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已将志书正式定性为“资料性文献”，从而被史志学界视为“彻底告别了‘史书’‘地方史’乃至‘地理书’等传统观念。”^[66]在这种趋势影响下，“如果说方志学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人不可认可的话，在如今说这个话，反对者不会很多了。”^[67]

当然，从总体上看，“方志与历史的关系最纠结”的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特别是为方志界长期呼吁关注的学科“升格”问题始终未有进展。正如史念海所言：“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将会不断地引起讨论，可能要经历一段相当长久的时期，也许要与这阶段的修志事业相始终。”^[68]其实，纵观方志史发展的全过程，在史志关系问题上，

以下观点值得关注：“赞成方志的发展已使它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志学，成为历史学科（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不赞成它脱离历史学科而存在”。^[69]也许，这种认识和学科定位既符合地方志从史“志”到方“志”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更适应当今方志的编纂实践和学科建设状况。因而“志属于史但不等于史”，也是中国史志学界经长期探索对目前史志关系的基本定位。相信随着方志编纂的实践发展和史志学科的研究深入，史志关系研究也会在此基础上渐趋深化完善，进而不断促进提升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总体水平。

参考文献：

- [1] 王晖：《新方志理论研究管窥》《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4期。
- [2]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3页（版本下同）。
- [3]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8页。
- [4] 谭其骧：《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
- [5] 〔清〕罗士彝：《康熙鄯县志跋》等，同治《鄯县志》卷首《旧跋》。
- [6] 朱士嘉：《谈谈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料史》1979年第2期。
- [7]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7页（版本下同）。

[8]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9页。

[9]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方志立三书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版本下同),第532页。

[10]谢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6页。

[11]在史志学界,方志学归于史学体系已基本呈主流形态。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持“地理书说”等其他意见的也不在少数,且始终纷争不休,如晚清章学诚和戴震之争便是典型之例。

[12]林衍经:《史志关系论》《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3期。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页。

[14]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版本下同),第20页。

[15]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62页。

[16]陈其泰:《〈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17]赵翼:《廿二史札记》上册,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1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9]王晖:《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

之母》《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2期。

[20]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第19~21页。

[2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页。

[22]陈其泰:《〈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

[23]刘家和:《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4]陈其泰:《〈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

[25]《文史通义校注(上)》《书教下》,第47页。

[26]林衍经:《史志关系论》《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3期。

[27]李兆洛:嘉庆《东流县志例》,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刻本。

[28]傅振伦:《编修新方志管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29]念白、庆余:《〈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30]转引自韩章训:《谈〈史记〉〈汉书〉对方志体例的影响》《浙江方志》2015年第3期。

[31]陈国生等:《我国方志的源流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利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2]孟繁华等主编:《二十四史导读(第一册)》,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第27

页。

[33]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34] 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477页。

[35] 《中国历史大辞典》第2634页。

[36]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第1885页。

[37] 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版本下同），第122页。

[38] 谭其骧：《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

[39] 陈泽泓：《方志定型说析论》《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2期。

[40] 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第163页。

[41] 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序，中华书局1967年版。

[42]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古方志考》第2页。

[43]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195页。

[44] 参见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第256页、260页。

[4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7页。

[46] 黄燕生：《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内部刊印本第13页。

[47] 刘纬毅：《试论明代地方志》《社会

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48] 李玠：《康熙畿辅通志序》（康熙二十二年）。

[4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9页。

[50] 《中国历史大辞典》第636页。

[51] 钱茂伟：《以史入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

[52] 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

[53] 瞿宣颖：《志例丛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54] 李泰棻：《方志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55] 黎锦熙：《方志今议》，岳麓书社1984年版，《方志学两种》第21-22页。

[56] 顾颉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计划书》《宝树园文存》卷1，第300页。

[57] 梅森：《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期。

[5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4页。

[59] 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60] 傅振伦：《编修新方志管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61] 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

[62]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

史志论丛》第324-330页。

[63]潘捷军：《“史”“志”关系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64]陈泽泓：《方志定型说析论》《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2期。

[65]梁耀武：《“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66]王晖：《新方志理论研究管窥》，《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4期。

[67]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上海地方志》2014年第4期。

[68]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69]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作者：潘捷军，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二轮《甘肃省志·邮政志》等5部省志 和《天水市志》通过终审

2019年4月23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何伟主持召开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通过二轮《甘肃省志》分卷《民政志》《邮政志》《民主党派工商联志》《司法行政志》《住房和城乡建设志》5部志书和1部《天水市志》。

会议评议认为：5部省志和1部市志在编纂中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篇目设计合理，突出了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符合新编志书要求和规定，会议原则通过终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高天成供稿）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地方志事业大发展

李振宇 高天成

摘 要：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独具风采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两千多年来，地方志承载历史，代代相传，连绵延续，永不断章，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发挥了“记载历史，传承文化，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积极作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及其表现方式之一的地方志文化要在坚持自身发展繁荣中，积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地方志 传统文化 关系 作用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创造性地扩展和完善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谱系中，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上升为国家共识，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地方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及其表现方式之一

的方志文化如何在坚持自身发展繁荣中，积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对

提高人民的思维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有重大价值的优秀精神成果的总和。^③

一是核心理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这些核心思想观念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二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这些传统美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三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这些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经过长期演进而形成的一种民族特征，能够反映中华

人民的精神内涵，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彰显中国胸襟的思想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凝聚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气魄加以提炼的结果，是新时代全社会遵循和倡导的主流价值理念^④（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影响）。

作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地方志书，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狭义的地方志仅指志书，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在历代方志编修的漫漫长河中凝炼形成的方志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与国史、家谱一起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富厚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若以周初的“古国史即古方志”算起，地方志编修已有3000多年历史，若从汉代的“郡书”算起，至今也有2000多年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存新中国成立前编修的旧志8000多种10万多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这些旧志“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大规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经几代方志人的努力，全国首轮、二轮

修志共出版三级地方志书82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4万部，地情书1万余部等等，^⑥形成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这些文献忠实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新中国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纽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优秀革命文化和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为文化强国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古以来，中国就注重从地方志汲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和力量。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的产生，与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化民众等有密切关系。“古者列国有史，秦汉而下郡邑例得有志，以志时事。”至今仍流传着韩愈索志、朱熹下轿问志的佳话。

国外对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性非常重视。美国学者伯恩斯教授和拉尔夫教授合著的《世界文明史》一书在“历史的黎明”部分，用专章论述了古代中国文明。其中在商代部分写道：“这个古代文明已有一个文字体系……有一大批文字被保存在刻辞的兽骨、角和龟甲上……刻辞虽然很简略，但对它们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商代社会及其活动的许多方面”。美国学者亚力托也有一段评

论：“自宋以来，方志在形式上和内涵上的一致性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说，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国外学者的上述论述充分显示，我国地方志的悠久历史与传统优势举世公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成立了地方志小组。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一到成都，立即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灌县志》等志书，并选辑其中一部分内容印发给与会领导，提倡利用地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并倡议各地编修地方志。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地方志。1989年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指出：“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些实例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地方志的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2014年2月考察北京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在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地

方志部门与其他机构共同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做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这些指示精准地指明了地方志工作的当代功用，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作了三次批示，其中“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明确了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定位；“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明确了当代地方志工作者的定位。刘延东副总理两次接见全国地方志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和批示。2016年5月12日，王勇国务委员出席《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总之，地方志是传统与现代的最佳连接点，既能延续本土文化“根脉”，又能推进当今文化建设。其全面性、权威性、资料性具有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优势，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作用，是中华民族延续文脉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历史传统的重任。可以说，地方志作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推动和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更加自信、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贡献“志”力。

二、地方志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因，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提供基础性资料

的重要作用。“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标志性形式，在教化人心、固化信仰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头活水，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一些地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比如有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联合教育部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过程中，通过乡土教材培养中小学生的爱国爱乡观念，通过“乡贤”文化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文化强国要以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支撑，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为标志，以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为基础。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并提出一系列相关重点任务和措施，如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加强国民礼仪教育，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传统戏曲振兴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公共空间，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传统体育，培育

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支持中华医药、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积极宣传推介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通过一系列举措，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地方志恰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因，它可以为各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基础性资料。

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丰富滋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地方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历经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方志编修中，培育形成的方志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独具特色、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地方志文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是中华文化的丰富滋养。

方志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容。地方志文化属于野大文化治范畴，内容极为广博，地方志记录事实，积累资料，强调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其最大优势就是拥有大量的结构化数据，根据甄选的资料，横分百科门类，纵述历史事实，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著述比地方志更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门类愈来愈多，许多志书中一种事物可以横分为三四个层次数十项细类，可

见当代新志书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地方志反映了方言、环境、饮食、建筑、自然生态等地方特色。我国地域广袤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不一，方言、民族、饮食、建筑、环境、生态等多方面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在志书中将这些差别充分反映出来。地方志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能够充分反映每一区域独自的地方特色。地方志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典籍，地方志文化是一种持续生成和历史演进的文化。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传统，经过历朝历代，始终不断传承，特别是每逢国家繁荣时期，就会有修志编史的高潮。地方志的连续性还表现为在记述的时间上，纵不断主线，不遗漏记述时段之内的大事。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之中大部分是地方志文献。地方志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资料性、权威性，形成了地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属性和独特魅力，成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知识宝库、智慧宝库。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本身离不开也必然贯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地方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化、弘扬历史传统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承担着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中国历代旧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

两轮大规模修志编鉴，积累了海量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形成了内容权威、系统、丰富的地情资源宝库，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而流淌其间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基于此，可以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志一直在路上。特备需要指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两轮修志成果（志书、年鉴、方志丛书、方志学刊、方志网站、方志微信公众号等）刊载了中华民族各个地方从古至今尤其现今的优秀传统道德和良风美俗，成为各地实施优秀传统道德和良风美俗教育撷取实用教材的文库。在两轮修志实践中，全国各级地方志机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崇正义、重民本、惠民生、讲仁爱、守诚信的思想理念，忠贞爱国、敬业担当、自强不息、崇贤向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向上向善、立德树人的精神人文记述体现在两轮志书的人文部类篇章中。同时，在这些篇章中充分体现出经典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使地方志载体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强文化阵地。

三、地方志事业要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贡献自己特有的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

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⑦。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是维系中国历史连续性、树立中华民族主体性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全面部署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继承和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地方志事业作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推动和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贡献力量。地方志既能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灵魂，发展地方志事业是维系中华文化血

脉、克服文化“古今脱节”的重要手段，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系和统一起来的有效方式。因此，大力发展地方志事业，实现地方志事业发展繁荣，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方志要为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民族凝聚力贡献力量。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既相互交融、又特点鲜明。发展地方志事业，既能准确地再现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光辉业绩，又能充分展示各地区、各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历史的精神风貌。将地方志成果转化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教科书、地情书，以地方志记载的真实资料和生动史实，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在培育文明风尚、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地方志独有的作用。

地方志要为增强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但很多国外民众对中国、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仅仅停留在熊猫、中国结、气功武术等中国符号上，对中国社会存有偏见和误解。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建立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先进性的结合上。地方志因其独

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为各国所关注。同时，地方志是最全面的资料书，能记载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建设的真实进程，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全貌，能准确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能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又能真实展示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建设的全貌，还能全面反映中国不同地域之特色，是与外界交流沟通的一个独特窗口，拥有其他文化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刘延东副总理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讲：“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着力将方志打造成为弘扬传统文化魅力、展示国情地情、具有普遍研究价值的文化产品，配合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

地方志要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重塑民族文化资源贡献力量。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地方志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是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当代中国结合的产物，承担着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的重要历史使

命，最能够将中国特色记载清楚，应该成为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利器。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开展的地方史编纂工作，中指组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项目，正是落实《意见》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的具体措施。

地方志要为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贡献力量。要善于从地方志成果这个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正在全国组织开展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中国名镇影像志等工作，正是落实《意见》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的具体部署。地方志更要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生产丰富多样、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质地方志文化产品，增加地方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加强对中华名山、中华名江（河）、中华名酒、中华名剧、中华曲艺、中华节日、中华老字号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组织创作生产一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亲和力的书籍成果，让这些成果走进人民群众、融入生产生活中。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伟大的时代需要产生质量更高、内容更多、规模更大的地方

志，这就需要地方志事业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全体地方志工作者要加倍努力工作，用手中的笔，使方志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芒，为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注释：

①新华网：《习近平十九大报告》，2017年10月27日。

②《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③张继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张静：《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研究》，西安电子科大硕士论文，2017年。

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⑥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2016年11月份对全国地方志系统工作进展情况的统计。

⑦《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辛树帜的兰州大学情怀

张 慧

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在祖国版图中心、西北黄河之滨的丝路重镇兰州，坐落着一座遐迩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甘肃贡院。1909年，甘肃贡院更名为甘肃法政学堂，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学府。1913年，甘肃法政学堂改

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学校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此后校名几经更迭，1946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学校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辛树帜。

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1915年考入武昌高师生物系。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远赴欧洲，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27年回国，担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

1932年，辛树帜赴陕西考察，广袤而又贫瘠的大西北黄土高原给他以深深震撼。1936年，辛树帜不顾西北落后的条件和创业的艰难，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在陕西武功创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并担任校长。1946年，受命国民政府派遣，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并任校长。1950年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



长。先后当选第二届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等职。1957年，辛树帜在参加全国会议后，毛泽东主席嘉许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情系西北，创建兰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出于开发和建设西北的考虑，于1946年3月26日召开国民政府行政院第723次会议，决定成立“国立兰州大学”，任命辛树帜为校长，负责学校筹建工作。因辛树帜很早就对西北历史和现实有深刻了解，又有在西北地区兴办高等教育的丰富经验。辛树帜在倡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就说过：“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之工作。”

当时，兰州有四所大专院校，即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甘肃学院、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师院、甘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三所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初来甘肃，对在兰州的几所大学全面考察，从全局的角度对筹建兰州大学作了精心谋划后认为，“复兴西北文化，其要在充实与提高其中小学校之程度。而大量优良师资之培养，则为达成此目的之第一条件。故西北师范学院，实以保持现有独立

规模为宜。”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得以保留发展西北师范学院。

1946年6月，辛树帜向教育部提出了办理国立兰州大学计划大纲，确立了兰州大学的基本构架：“兰州大学今后规模，拟就甘肃学院改并之法学院，与西北医学院改并之医学院，并按大学规程，调整增设之文学院、理学院、与特设之兽医学院五院而成。”

设立兽医学院，是辛树帜立足西北地区历史、社会、人文特点，确立培养人才方向的一个创举。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且多从事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具有巨大潜力，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在兰州大学特设兽医学院，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西北地区民族团结，为国防上一大举措。辛树帜指出：“今若以近代之兽医学为主，能解决西北马、牛、羊、骆驼之疾病，得蒙回番信仰。同时进行皮毛工业，又将湘茶、书、果供给彼等，彼等在学习上与我息息相关，西北自无问题矣。”这一建议得到了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支持，兽医学院得以顺利设立。

在文学院内设置边疆语文系，同样体现了辛树帜对西北边疆开发和加强民族团结的远见卓识。辛树帜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辛树帜在向教育部的报告中写道：“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治国

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这一建议得到教育部认可，于1947年9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文、藏文、维文三组，为国内首创。

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形成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26个系科组成的特色鲜明的综合大学。

“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刚”，人们这样概括辛树帜在兰州大学的“办学三昧”。

一是延揽人才。“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使兰州大学早日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辛树帜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兰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人们视兰州为畏途，延揽人才的难度较之陕西武功更大。但他以坚强的事业心和尊重人才的品格，说服和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从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3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顾颉刚、史念海、李天祐、裴文中、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

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许多人是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感召而来。辛树帜先生崇高的人格力量、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坦荡博大的胸怀，深得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钦佩，称赞他“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

辛树帜不仅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而且重视提携后进，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47年仅在医学院，辛树帜就派出李武功等5人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深造。

二是购置图书。为了给人才培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辛树帜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兰州大学筹办伊始，他即以充实图书为急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搜求，共购得图书约9万册，至1948年图书馆共有藏书15万册。这些图书不仅为师生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为专家学者进行教学科研事业奠定了浑厚的基础。兰大新图书馆落成，辛树帜校长采用顾颉刚的建议，名之为“积石堂”。顾颉刚亲撰《积石堂记》，高度评价辛树帜先生建设兰大的功绩：“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全力于购置图



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牍数百事。未几，战祸突兴，陆行阻绝，又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至十五万册，卓然为西北巨藏矣。”

三是添置仪器。1946年6月底，辛树帜提出的兰州大学计划大纲经教育部核准后，即在南京约请各科专家开列图书仪器名单，斥资定购。在1946年第一批运到的200箱图书仪器中，较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显微镜16台、天平3架。1947年，辛树帜又派员耗资2亿元法币，订购物理、化学、生理等方面仪器药品达250余箱，理学院各种试验药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为了满足医学院教学与试验，他还委托美国医药助华会驻华办事处从美国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器械，保证正常教学与科研的进行。

辛树帜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使国立兰州大学在内战的炮火声中创造了快速发展的奇迹，在院系设置、师资力量、招生规模、办学条件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迅速跃升为西北一所著名大学。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

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试图胁迫他前往台湾。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并表明心志：“我决心留在国内，终生教书，并作生物学研究。”1949年2月，辛树帜前往广州参加戴季陶先生葬礼，转道上海，曾对

老友顾颉刚说：“我不去台湾，希望你也留下来。”顾颉刚欣然答允。随后，辛树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兰州。

1949年5月，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强令在兰的四所大专院校迁往河西走廊。为了保存甘肃高等教育成果，辛树帜采取种种拖延手段，与马步芳和特务分子周旋。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辛树帜与全体教职员工坚守校园，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

辛树帜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忠于科学，勤奋好学，热心教育；为人耿直，品德高尚，事业心强；乐于育人，延揽人才，知人善任；奖掖后进，甘为人梯，不遗余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参考文献：

[1]《辞海》《辛树帜》条，1979年版。

[2]姜义安：《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的辛树帜》《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3]刘宗鹤：《辛树帜先生传记》辛树帜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4]一叶知秋：《辛树帜献身西北高等教育事业史略》2013。

（作者单位：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

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滕 辉

摘 要：年鉴的主要功能是资料性、综合性、工具性，表现在供广大读者和公众查阅、检索和使用。年鉴所提供的资料的可用性、实用性、使用性就成为衡量其质量的重要标尺。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在总体设计、内容编写、板式利用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找到解决的途径，才能有效提升质量。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 编辑问题 解决办法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它的主要功能是资料性、综合性、工具性，表现在供广大读者和公众查阅、检索和使用。年鉴所提供的资料的可用性、实用性、使用性就成为衡量其质量的重要标尺。本文对年鉴编辑的总体设计、内容编写、板式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一、总体设计方面。地方综合年鉴的内容根据信息资料的具体构成，以其作用为标准，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一是综合情况；二是动态信息（年鉴的主体内容）；三是辅助资料；四是检索系统。这四个方面作为综合年鉴的组成部分，是年鉴内容框架的四大支柱。年鉴内容四大部分的构成比例，

不同的年鉴往往会有不同的方案。许家康对国内外30种较有影响的年鉴作过统计分析，其平均值是：综合情况占7%，动态信息占56%，辅助资料占29%，检索系统占8%。这样的结构比例是较为合理的，值得大家重视。但不少地方综合年鉴的编辑者对此不以为然，导致这四大部分内容残缺不全。

（一）综合情况篇幅难以承担反映地方基本情况和年度综合情况。年鉴综合情况是年度资料性的集中体现。综合情况策划设计和内容安排的基本要求是“概”而“全”。“概”就是简约概括，“全”就是对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和相关基础信息没有大的遗漏。综合情况常有“概貌”“总述”“综述”“概述”“概况”等几种表现形式。通常，年鉴先用“总述”“概貌”，地概括说明地方行业的基本情况，然后分门别类进行具体记述，

通过综合情况对全书起统领作用。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综合情况篇幅太小，栏目过少。完全缺少综合情况的并不很突出，但有综合情况的部分年鉴，综合情况的篇幅都很小，内容都有所不足，表现在栏目不多、内容单薄，有人口无语言，有民族无宗教，有自然无地理等。半数以上只记述经济建设成就，不涉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情况，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市、县的基本情况和年度综合情况。二是记述综合情况片面，基础信息不全，缺漏项较多。常见的问题是：有的分目下的综合性条目“概况”只概括说明年度工作情况，不提供相关的基础信息；有的“概况”条目只空泛地说明基本情况，不提供基本指标数据。在不少年鉴中，查不到有多少共产党员、有多少民主党派成员；至于医生、护士、农民工等等数据，更是无处可查。

为了达到“概而全”的要求，年鉴综合情况的内容设置，一般都应该包括地方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语言、资源、环境、民族、宗教、领导机构及领导人等基础信息，还应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在分目中体现综合情况的记述【概况】可采取：综合情况=工作主体+年度主要工作+业绩与发展特点的结构模式。为了避免与其他条目内容重复交叉，综合情况介绍的内容一般是粗线条的勾画，点到为止，不深入展开。这样的内容结构既能宏观反映各地、各部门行业的概貌，年度的特点，又能避免与后面的内容重复。可适当提炼综合情

况的标题，将“总述”名称改为“XX市（县）概貌或概览”，“综述”“概况”标题，根据其概括记述的内容，加上一个特定的主语或其他中心词，对名称加以范围限制，提高信息的指向性和可检索性，如“文化综述”“XX机关工作机构及工作概况”等。

（二）动态信息分类不够科学、合理。动态信息是年鉴的主体内容，分门别类记述年度的大事要闻及相关基础信息，通常占全书总篇幅的50%以上。由于篇幅较大，合理分类就显得十分重要。从当前出版的年鉴来看，部类的划分多数都比较整齐、周全，缺门漏项的并不多见，只是分类有粗有细，类目有多有少而已。有的年鉴实行大类设计，类目只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七八个；有的年鉴实行中类设计，类目多达二三十个，这都可以。问题在于往下细分到第二次、第三次，有的年鉴就显得不够周全、不够严谨了。不够周全，是在分目这个层次上，有不少疏漏。有的重点旅游县（市、区）年鉴，没有旅游规划建设、旅游行业管理的分目；有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年鉴，没有扶贫开发、社会扶贫的分目等。不够严谨，是不严格按资料的性质分类。如，邮政通信、电信通信、移动通信依其资料的性质本应合并设立“通信”分目，但有的年鉴却分别设立互相并列的3个分目。

（三）辅助资料选择编排不得体，内容部分缺失。年鉴辅助资料包括领导讲话、工作报告、法规文件、统计资料（图表）、大事记、书目文摘、附录等便览性、指南性、参考性资料。这部分资料在年鉴中一般占有

30%~40%的篇幅。常见的突出问题是：1. 缺失图表，大部分年鉴的图表都是寥寥无几，缺少珍贵的表格资料；除有统计资料的几张表外，正文几乎很少配图表；2. 在使用照片上，重会议及领导调研等照片，轻实事工程和有年度特点的照片，往往把随文照片作临时凑数、补白，部分照片存在取材范围小、主题不突出，照片数量少、质量差，甚至出现重复使用同一张照片。在我省出版的近50部年鉴中，多数年鉴很少有随文照片，年鉴前部公益性的彩页照片的收集和编辑也比较随意，不能反映一个地区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项目的总体情况；3. 在图的制作上，大多无政区图或地图，有地图也无审图号；4. 在表的制作上，应该用表的不用，同类项文字，没有表格。一般来说一部100万字年鉴的照片在150~200幅较为适当，前部公益性彩页在20个全版左右，表格在80~100幅左右（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中的图表外）为好；5. 附录内容形式单一，没有特色，地方综合年鉴完全没有开发利用文摘、名录、文献目录、索引等多种资料形式。多数年鉴只收录政府出台的文件法规，还有一些年鉴“附录”的内容杂乱无章，没有标准的收录当地一些文人字画、文章和编者自己的诗文等等；而有的年鉴有“附录”之名，却无附录之实。年鉴“附录”的内容资料应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实用性，即经过精心筛选，独具特色，读者用得着的重要指南性资料。二是便览性，大多采用表格或开列式的表达方式，读者一目了然，一查即得。三是超时空性，即有选择地收入一些

跨地域、跨年度的重要参考性资料。这些资料放在正文中有悖年鉴年度性的体例要求，而放在附录里就比较妥帖。这就为年鉴长期积累一批实用指南性资料，形成自家年鉴的特色和风格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多数年鉴未能把握好“附录”内容资料的以上三个特点，因而未能编出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附录”。

（四）检索系统不完备。主要表现在缺少索引、参见、注释等。在编有索引的年鉴中，索引量大于目录数量，并且能够引入参见、注释、附见编排方式的年鉴少见，即使有索引，多数索引款目数与目录数量之比都在1:1以下，并且许多索引等同于将目录按汉语拼音的顺序重新编排。地方综合年鉴常用的索引形式有内容分析（主题）索引、专名索引和图表索引三种。设置索引有两条标准：一是要有较为合理的索引量，增加索引深度，满足读者检索需求。一般的比例为1:1.5或1:2.2；二是要有规范标引，有序编排，引入参见、互见编排方式，能起到整合信息，重组资料，方便检索。

二、在内容编写方面。地方综合年鉴记载的是一个行政区域内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上一年度内经济社会的新进展、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供读者查找资料、了解地情，正因为如此，各级各类年鉴编辑部门都在尽可能地增强年鉴的实用性。常见的问题是：

（一）稳定性选题偏多，动态性选题偏少。一般年鉴条目依其是否稳定设置，可以分为稳定性条目和动态性条目两大类。稳定性条目一般年年设立，条头不变，内容更

新,具有栏目化、常设化的特点。例如,司法行政机关的“劳改劳教”“社区矫正”“律师事务”等。动态性条目从条头到内容均为新设,反映年度内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某一具体事物,是单一性条目,其主题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个动态条目只能反映一个事件或事物,而不能涉及与主题无关的其他内容。例如“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启动”“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西固民俗馆建成”等。这类条目的特点是年度性特强,新鲜活泼,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年鉴逐年编辑连续出版,内容资料既有新颖性又有连续性,这是年鉴的一大特点。为了体现内容资料的连续性,跟踪反映年度的新情况和新资料。年鉴应当有一批相对稳定性的条目,例如各个领域的综述条目,各部门、行业的概况条目,以及反映某些经常性专项管理、专项业务基本情况的条目等等。这类条目在通常情况下稳定设置,内容逐年大部更新或全部更新。这是年鉴内容连续性的基础。问题是稳定性条目数量过多,所占比例过大,从条目标题看不出什么新意,年年似曾相识,成了“规定动作”,制约了年鉴的新颖性。合理的度和基本的要求是:条目选题应大部更新。一般要求稳定性条目所占比例不超过条目总数的40%,非稳定性条目即年度动态性条目占条目总数的60%以上,最好能达到2/3以上。就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行业或单位来讲,总要有几个选题是新的,不能年年设立的条目都一个样。这是年鉴常编常新的需要。

各类年鉴对动态性条目的选题,有一个

通用的标准:“重、新、特、热”。“重”就是重大事件,即对当前和今后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事物,包括举办的重大活动、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作举措或成果等;“新”就是新生事物,即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具有推广价值的事物,包括首次发生的事件或产生的事物;“特”就是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色的事物。如中医药产业、马铃薯产业大会等;“热”就是热点事物、社会焦点事物、群众普遍关心的事物、读者经常检索的事物。

(二) 记述深度普遍不够,内容的全面性不足。所谓深度不够,是指内容比较肤浅、单薄,未能提供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有效信息。年鉴是资料性文献,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检索需要,在多种传媒、多种信息载体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更多的读者,年鉴应当以“博、大、精、深”取胜。“博”是内容广博,涉及面广;“大”是成书规模大,信息资料容量大;“精”是精选精编,内容精当;“深”是选题选材和记述有一定的深度。年鉴容量不足,资料不全、不新、不精、不深,将无优势可言,甚至会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对照“博、大、精、深”的要求,我们不难发现年鉴中存在诸多不足,突出的问题是记述深度普遍不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栏目和条目未能细分主题,拓深反映的层次。例如,反映自然灾害的内容,未能将其细分为旱灾、水灾、风灾、地质灾害等;记述物价变动情况,未能将其细分为生活资料价格、生产资料价格、服务价格以及股市、楼市的行情价格等等。再有年

年鉴编者应在条目的内容记述上下功夫，写深写透写实。这就需要编辑开动脑筋、善于思考、主动出击、四处搜罗，扩展年鉴的内容，增加年鉴的材料，丰富年鉴的“血肉”，充实年鉴的内涵、扩展年鉴的记载面。编辑要主动与作者联系、告知所需要素，重新加工形成一个崭新的、有价值的条目。总结笔者在审读一些年鉴在记好条目方面有几种好的做法可资借鉴。如：命名表彰条目：不能仅仅只写何时何单位受到什么命名和表彰，还应当写出受到命名和表彰的原因，受表彰单位做出过哪些突出的业绩。政策制度颁行条目：不能只停留在介绍文件名的写法上，而应将政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交代清楚。新出台的改革措施条目：不能仅仅写改革的推进，而要先介绍改革的基本精神。工程建设项目状况条目：不论是启动还是竣工的，都不宜单纯只记启动情况或竣工情况，而应对工程内容有整体介绍。统计调查条目：不能只写开展哪几项调查工作，应尽可能把统计调查结果呈现给读者。另外，有的年鉴在条目后设“资料链接”，对条目中内容作进一步深入介绍，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条目内容，这样也能起到深化条目内容的作用。二是选题不分重点和一般，条目内容较为粗浅。所谓重点，主要是指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成就、重点领域、重要机构、重要人物的条目。重点条目的选材应当深一些、细一些，一般条目的选材应当浅一些、粗一些。如果不加区别地平均分配，所有条目都只提供资料线索，年鉴的可读性、实用性必然大打折扣；反之，所有条目的记述都深入

一步，都提供详尽资料，则年鉴的篇幅将会无限膨胀。司马迁的《史记》，130篇，52万字，记述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前中国古代3000年的文明史，不但历史脉络分分明明，而且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记述，十分生动感人。《史记》中司马迁为重要人物立传善于区别重点和一般，一般不表或三言两语，重点则浓墨重彩；重大历史事件运用全景式写法，重要历史人物大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年鉴编辑很有必要借鉴《史记》的笔法，将一般情况的高度概括和点上重要情况的深度报道、生动具体记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重视情景记述，重视语言的情趣和人情味，以提高年鉴的可读性。

（三）部分条目编写有失规范。条目编写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这是由年鉴的工具书性质决定的。具体包括九个方面：一是条目有相对独立性，即必须是可以独立检索的资料主题；二是选题选材有统一的时间界定，基本内容以一年之内的信息资料为主，以跨年度的历时性、背景性资料为辅；三是有统一的设条标准和选材原则；四是有统一的内容要素规范和记述程序要求；五是统一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字表达通俗、简明、生动；六是统一各种名词、名称；七是统计数据前后左右不矛盾，量词基本一致；八是时间表述写出准确的世纪、年代和年、月、日，不使用模糊不清的时间代词；九是条目辅助资料（表格、示意图、照片、解释性资料等）与条目释文配合紧密，内容不相佐。以上述要求来对照部分年鉴，不难发现

有许多不足之处，这里着重分析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相当多的条目缺乏相对独立性，不便于独立检索。如内部管理、自身建设、对外交流、业务拓展等。这些选题和主题标引缺失中心词、关键词，缺乏独立检索意义；二是部分条目内容要素不全，事主、时间、地点不明。在条目编写中，为了节省篇幅，高度密集有效信息，凡是用名词、名称或独立的概念作条头的条目，如某些地名条、机构条、企业条、产品条、成果条、项目条、会议条、展览条、节庆条、人物条等，都可以借用辞书辞条的特殊写法，以条头词代主语，用无主句直接诠释。只要主语不切换，可以一直省到底。以条头词代主语，用无主句直接诠释，必须把握一个前提条件，这样的条头词必须是名词、名称或独立的概念，否则不行。例如用“兰州市第八届老年人运动会”这样的名称作标题，自然可以广泛省略主语。但如果用“兰州市第八届老年人运动会成功举办”这样的句子来标引，就得另外造句，主语不能随意省略，至少在开头不能省略。当然，前面有了主语之后，后面承前省略也是可以的。

（四）保密意识不强，审核把关不严。保密无小事，从当前出版的年鉴来看，主要表现在军事、自然资源方面。如类目“军事·法治”中的“军分区”“武警”“预备役”“人武部”的领导名录、征兵数量，军事演习的演习代号、军粮的储备地址、投资数、建设项目等属于军事涉密；表现在自然资源方面，如稀有金属钼、镍等矿产的工业储量；

再有政策性粮食储备、供应信息，中央、省、县三级储备粮规模布局、钢材木材、稀有金属、矿产储量、战备广播电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全国重大工伤事故、霍乱狂犬病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等、财政信贷、在建已建战备通信、国防公路和国防意义的桥梁、隧道、航道的水深等等涉及保密的事项。所以，编者要增强保密意识，学习保密知识，各个部门、单位提供的资料需经本单、本部门领导审核把关。再有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工作条例》第十二条的要求，要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进行会商。

三、版面利用方面。一些年鉴在版式设计方面，一直存在版面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单位版面的字容量过少、标题占行过多和图片使用过大等。有的年鉴只有五六十万字，却硬是要撑成砖头厚的一本书，这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参考《世界年鉴》：为小32开，双栏排，每页版芯77行，每行平均116个字母，单页有8932个字母，如按两个字母相当于1个汉字计算，每页字数为4466个，比大16开年鉴要多很多。如《福建年鉴》也由初创时期的每页排2000字，加密到现在每页排3200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潜增容：一是减少留白，二是扩大版芯，三是缩小字号，四是缩小图片，五是标题占行要适度。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副处长）

二轮《民乐县志》述评

张志纯

继上溯远古、下限 1990 年的新中国首轮《民乐县志》之后，上接 1991 年、下至 2012 年的第二轮《民乐县志》，2018 年 10 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这部县志涵量宏厚，内容丰富，共设 35 篇、152 章、495 节、128 万字。述、记、志、传、录、图、表七体俱全，天、地、人、文、经、社各类齐备。全方位、各行业、逐层次的系统记述了民乐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全县精神领域、物质领域、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全志囊括百科、承载万事，荟萃了 20 多年发生在民乐大地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气象、新面貌。

综览全志，有四个特点：

一、时代特征鲜明

第一轮通志以后的修志，都为“断代志”，它基本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限内，所记事物是这一断限内所发生、所形成、所造就的真情实况。1978—2018 年，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 70 年的当代史上是一段不朽的

40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使祖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生活。这部县志的记事虽起于 1991 年，止于 2012 年，但以承前启后的内容来看，它主要反映的是“改革开放 40 年”这一辉煌周期的大变革、大变化。二轮《民乐县志》的面世正是春华秋实的 2018 年，全篇首先体现了新时代、新时期的时代风貌。民乐国民经济 4 个五年计划超越实现；三大产业突飞猛进，产值上升，创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日新月异，一年比一年好；城镇建设全面发展，平房消失，楼房林立，旧县城变新县城，新县城比旧县城面积增大几倍，民乐六坝新城正在崛起；昔日交通是人行便道，马车土路，如今是乡村道、县市道、省国道，还有高铁通四方；昔日农民住房是土坯矮房，三代人挤一炕，如今是砖瓦房，新楼房，宽敞又亮堂；昔日灶具柴火土灶，烟熏火燎，钉碗补锅，缺盆少碟，如今是液化气、电磁炉、电冰箱、还有洗衣机、电视机；昔日照明是昏暗煤油灯，如今是亮

堂的电灯、节能灯；昔日人畜共饮一池水，驴粪马尿在水中，如今家家通上自来水，户户干净又卫生；昔日出行走路或马车，如今出门自行车、电动车、小汽车，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昔日商品紧缺，供不应求，全凭票证排队购买，如今是全民经营要啥有啥；昔日吃饭过年过节才见肉，如今每天佳肴都腻肉；昔日穿衣一年四季老一套，修修补补不变样，如今人人都有好几套，常换常新常变样；昔日通讯靠写信，十日半月才收到，如今手机人人有，时时刻刻随呼唤；昔日职工月薪几百元，如今都上千近万元；农民低保月月有，医疗治病也报销；昔日农家遇事借钱累债，如今家家都有存款；昔日农民吃饭靠国家供应，困难靠国家救济，如今国家不仅免除“皇粮”，还要大量投资建设新农村，拨款补助农民，扶持农业。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条件的保障，精神状态的转变，人们体质的增强等因素，全县人均寿命40年前后相比，逐步有所延长。

改革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县变、乡变、村子变，人变、心变、精神变，一切欣欣向荣、焕然一新。这一特殊时代的巨大变化，将给世代人民留下铭刻心头的永恒记忆。

二、地方特色突出

县志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区域县一级综合志，地方性最权威、最典型、最有代表性。县志功能的核心在于地方性，二轮《民乐县志》较好地突出了这一特色。

主要表现在：（一）丝绸南路要冲、历代军事关隘、甘青两省交通枢纽扁都口，是河西走廊通向青藏高原的南大门；县境南部的祁连山，主峰并列、山岭相连，冰川林立，终年积雪，是自然界赐予民乐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库”“自然水源”；祁连山脊以北深藏金、银、铜、铁、煤、石灰、石膏等矿，为民乐物质建设储备了丰富的资源；山麓森林、植被、草原构成美丽的生态环境，为民造就致富条件；广袤的倾斜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为世代人民提供了宜居、宜耕、宜牧、宜植的理想天地；山区八条河流入川，水库分布，渠道纵横，成为万物的生存依托。（二）民以食为天，民乐盛产粮油。东、西灰山出土的碳化粮粒，为全国首见。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中，民乐农业连年丰收，粮油增产，被列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1991年至2012年，全县粮油播种与产量逐年递增。粮食作物1991年总产12.32万吨，2012年达25.7万吨；经济作物1991年总产3.67万吨，2012年达9.63万吨。两项分别翻1倍多和3倍多。民乐小麦、大麦、玉米、马铃薯蜚声各地，油菜驰名全省，大蒜闻名遐迩，中药材青睐全国客商。（三）为拓宽获得领域，扩大收益范围，1995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发千年古荒北部滩。经几年苦战，开荒3万多亩，创办园、林、农场42家。国家和省国土资源部、厅批准开发市、省、国家级土地整理项目14个，总规模达2千多万公顷。（四）县的支柱是乡镇和社

区。县志专设一章“乡镇·社区”，对乡镇情、社区情作了简要载录。这对综览县情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2年间乡镇、村变动两次，由多变少，有并有撤，以适应新时期的新需要，更利于促进改革，推动开放搞活。揭示基层建制的改革情况、经济状况、社会发展。

三、人文氛围浓郁

民乐条件制约，生活艰苦。然，苦则思变。勤劳勇敢，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取胜一切，是民乐人的特性。有史以来，肯学习，善钻研，奋发成才，担当各种事业的伟人、强人、能人见著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县志载录历代人物近千人，遍及各行各业。本次二轮县志载录22年间新增各种人物598人，其中“人物传略”13人，“人物简介”155人，副高以上知识分子189人，博士67人，民间知名人士21人；中央、国家部级表彰先进人物46人，省委、省政府表彰先进人物107人。本籍者勤勤恳恳为县奉献，客籍者忠心耿耿为民工作，都做出了突出成就。陇南宕昌韩正卿担任东江公社书记八年，赢得《红日照东江》后调民乐县委书记，带领干群苦干八年，建成中、小型水库6座；平整条田14万亩；植树造林3万亩；营造长180千米的渠、路防护林带15条；新建总长225千米的县乡公路2条；开发北部滩古荒地3万多亩，搬迁沿山高寒社队群众，新建“北部滩人民公社”。尔后又任定西地委书记，省引大入秦指挥连续干了两个八

年。四个八年共32年的卓越成就，赢得中央领导的好评。外界评论“民乐出人才”，社会公认的代表有：著作等身的西北文化名人季成家、企业改革的全国劳动模范许福林、诗作千首的中华诗人李中峰等等。就记载22年的《民乐县志》而言，近600榜上有名者，众多供职于县内，不少工作在省内外，有的在海外；他们广布于文教界、科技界、经济界、社会界，各行各业都有拔尖人才，领军人物。

县志载述灿烂的文化。以6编33章112节的巨篇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绽放出文化领域的朵朵花果。至2012年，教育高考成绩连续18年位居全市之首，25名学子考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近千名学子考入复旦、南开等重点大学。科研成果获全省、全国领先专利187项。群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市场空前繁荣。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大小医院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在全市、全省、全国屡获奖项。民间艺术种类繁多，作品精美，很多佳作被市、省、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农村文化大院”“民间文化之乡”“农民艺术节”普遍兴起。有19篇（首）文学作品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发表并获奖。有34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被省上和国家相关组织授奖并发表。诗词歌赋各阶层、各方面都创作。地方史志新旧都出版，地情资料年年印发。文献著述成果颇丰。民俗方言面广类杂。广电普及家家户户。

四、编纂志体规范

二轮《民乐县志》为小编体，框架排序为自然环境、行政区划、民族人口、党政团体、军事政务、经济体系、科教文卫、文物与附录。篇、章、节、目四级辖属合理，归属适当，名称确切。开篇前言语精意明，涵义清楚，且用楷体，典雅醒目。表述用语恰当，叙事本末有致。语言文句简炼，记事合情合理，内容实事求是。行文规范统一，无穿靴戴帽、无它文杂体、无行外用语、无错讹衍夺、无夹叙夹议、无半文半白、无交叉重复，无累赘废话。文表结合紧密，表格编号一致，表题称谓规则。图片选用精良，卷首彩图分类排列，文中插图紧扣内容，且皆具说明。人物传略与人物简介都配人物照片，看文见人，增强存史价值。各类层次用字配置档次有别。版本正16开，与首轮一样。

此志的优点还有：（一）弥补了首志之缺。例一，《常见方言词汇》把流传民乐祖祖辈辈的交际口语全面搜集整理入志保存，做了一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抢救工作。如不这样，随着一代一代的人老去世，这些民间语言文化就会渐渐消失人间。各种方言是民乐人在长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自由形成的口语符号，地方性、民俗性很强。《词汇》收录810条，编为“天地时令用语”“农事农具用语”“动物植物用语”“衣食住行用语”“婚丧嫁娶用语”“器件物什用语”“文化教育用语”“人际称谓用语”“动物状态用语”九个部分。另收

录被遗漏的习俗、谚语、俗语、歇后语、谜语、绕口令、童谣等，为民乐语言文化宝库增添一葩。例二，对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县级31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资料进行了重新挖掘整理，订正完善了文物的坐落位置、形成年代、形制规格、保存状况等。（二）校勘了首志之误。对首轮县志因撰稿、校对、排版及原稿有误等造成的失误、笔误、疏误、漏误、稿误，作了校勘补正，列表补记，纠正了讹误。（三）登录编辑人员表。浩大的文字工程，得益于众手成志。“附录”附“编辑与供稿人一览表”，将每一个供稿单位和每一位撰稿、审稿、编稿、改稿、核稿人员的姓名逐一登记，与志长存。这是修志者的志德，也是编志书的责任担当。

整体看，这是一部主要记录全县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巨大变化的县情总汇。在继续改革、持续开放的更大、更快、更好地发展中，为建设更新、更美的新民乐发挥资政教化作用。

（作者：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潜夫论》引《诗》的理论建构与《诗》史价值

赵玉龙

摘 要：《潜夫论》是东汉著名政论散文家王符的名著，也是汉代子书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大量征引《诗经》中的句子，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体现了王符深厚的诗学修养。王符引《诗》关注并反映现实，重在引以为据，阐明事理，不以解说诗义为目的。在用《诗》旨归方面，以《诗》证理、以《诗》明教、以《诗》论政，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在《诗》史价值方面，《潜夫论》突破传统的用《诗》模式，在用《诗》模式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同时也代表着汉代《诗》通学的勃兴。在解决《诗》学史上的一些学术疑难问题方面，《潜夫论》也突显出了重要的《诗》学史料意义。

关键词：王符《潜夫论》 《诗》史价值

《潜夫论》是东汉中后期思想家、政论散文家王符的名著，十卷三十六篇，是东汉议论文的典型和代表，刘振东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就指出：“《潜夫论》是体现东汉议论文主导倾向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1]《后汉书·王符列传》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2]王符虽是被边缘化的一介失意儒生，隐居僻乡，终身不仕，但其作《潜夫

论》在汉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王符《潜夫论》大量征引和化用《诗经》语句，笔者据彭铎《潜夫论笺校正》统计，书中直接或间接引《诗经》达97次之多。^[3]王符建构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和学说，在引《诗》上别具一格。通过对《潜夫论》引《诗》的分析，我们可窥探王符的《诗》学观和思想。有关王符的《诗》学思想，学界虽早有论及，^[4]但《诗》学思想作为王符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对于全面解读王符《潜夫

论》，以及深入理解《诗经》在汉代的传播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诗》与王符的著述动机

汉代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期，许多文人士子多受其影响。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一节中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东汉初期经过西汉末年的社会动乱，经学尚处于恢复元气阶段，但到了东汉中期，可以说是经学的大发展、大变革阶段。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王符，虽不是经学家，《潜夫论》也非经学著作，但在整个汉代经学思潮中，《潜夫论》亦多受经学影响，其对《诗》文献的征引和《诗》义的阐发就说明了这一点。

《潜夫论》一书大量征引《诗》文献，其中引《国风》18次14篇，《小雅》38次26篇，《大雅》33次17篇，《周颂》5次4篇，《商颂》3次2篇。除去重复，涉及篇目达63篇。总体上看，《潜夫论》对《诗》句的征引和化用灵活多样，体现了王符深厚的诗学修养。无论引《诗》发表政治观点、阐述己

见，还是作为理论依据，增强说服力，这都与王符的著述动机相联系，饱含着他同情民瘼，为挽救东汉弊政奔走呼号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体现了王符关注现实，为东汉弊政乱俗积极寻求解决对策的创作精神。

（一）王符的诗学修养

《后汉书·王符列传》载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马融、窦章、张衡、崔瑗都是当时的文章大家，能与他们一起交游论学，王符也一定饱读诗书。从《潜夫论》来看，王符的知识非常渊博，年少时勤勉好学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潜夫论》这样影响深远的巨著。《潜夫论·赞学》（下引该书，仅注篇名）中所言“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就表明了王符长期坚持学习的态度。

那么，王符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潜夫论》对“五经”、《老子》《论语》《孟子》《韩非子》《孝经》、纬书等文献的征

引来看，王符的学习内容非常驳杂，兼容并包，视野开阔。有一点需特别指出的是，王符的诗学修养非常好，功底扎实，《潜夫论》几乎每篇都有引《诗》，最后



一篇《叙录》亦如此。这首先是由王符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渐次蔓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时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当时就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说法。汉代孩童的启蒙教育就很重视对《诗经》的学习，如《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载冯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言周燮“十岁就学，能诵《诗》《论》”等等，都是例证。到东汉后期，由于朝廷的提倡和利禄的引导，社会上普遍形成了研习《诗经》的风气，对《诗经》的崇尚和看重成了人们的共识。在时代学术氛围和价值观的影响下，王符对《诗经》也颇为重视，也一定是熟读掌握了《诗经》的要义，《潜夫论》对《诗经》的大量征引就说明了这一点。

王符的诗学修养还表现在善于发挥引申诗语的内核，借助诗义进行现实批判。在引《诗》中王符不死守经义，根据论说的需要，将诗之内涵运用于说理之中，突出个人的意愿，注入政治理想，达到引《诗》以资治政的目的，这也是王符著述动机的一个方面。如《浮侈》云：

《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蛊惑百姓。^[5]

王符对当时社会的浮华奢靡现象作了深

刻揭露，“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给，比肩是也”，并指出“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他对社会中“舍农桑，趋商贾”“治本者少，浮食者众”，追求浮华的本末倒置现象深恶痛绝。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不打理家务、从事蚕桑纺织，而去学习巫祝之事，迷惑百姓，这是王符对时俗浇薄的批判。文中引《诗》见《陈风·东门之枌》，《毛诗》“女”作“市”。关于诗的主旨，本来是写男女相遇相悦的，但《毛诗序》曰：“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王符袭用《毛诗序》之义，且用“刺”字表明了态度，这与他反对东汉衰世虚浮奢侈之风的批判正好相合，也十分贴切。

此外，通过《交际》《班禄》《本政》《述赦》《三式》等篇中的相关引《诗》，也可看出王符深厚的诗学修养。

王符对先秦“赋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其诗学修养的重要体现。先秦时代长期有“赋诗言志”的传统，因诗以见意，借《诗经》中作品来交流情感，表达思想，这一般是发生在国君、卿大夫等上层人物之间，且是在正式场合下的一种带有公务性的活动。王符所处的社会显然已经脱离了“赋诗言志”的时代语境，但“赋诗言志”的话语实质在王符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他行文说理论证的必备素材。王符引《诗》注重经世致用，根据议政的需要，能够结合社会现实对诗意作出新的阐释，将

诗作为诱发引申现实问题的基点，大大扩展了“赋诗言志”的使用范围和功用，这是与王符对诗文本的熟悉和诗学素养密切相关的。如《相列》中引诗：“《诗》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赞学》：“《诗》云：‘题彼鹄鸨，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日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卜列》：“《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等等，王符都能将其与所论主旨相联系，为所述事理提供理论依据。

《诗》作为“六艺”之一，《汉书·儒林传》云：“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王符认为《诗》是圣人载体的载体，当时社会又常以经来决断是非，所以王符常引《诗》说理，对弊政乱俗加以批判。这也可看出王符对诗文本的熟悉，能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及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注入其中，不仅丰富了诗的内涵，从有利于个人修养、国事、民事等方面去阐发诗意，而且与所论主题融而为一，建构了独特的引《诗》体系。

（二）以义系《诗》，今古文通用

两汉经学有经今古文之分，西汉时主要以今文经学为主，到了东汉后期，今古文经学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并最终由古文经学逐渐代替了今文经学而居于统治地位。其中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今文经学的理论作了总结，而且以官方的身份开始了对名物的考证和文字的训诂。但随着东汉后期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衰败，统治者已再无力像从前那样关

心和支持经学的发展。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国蔬”（《后汉书·儒林列传》），经学的衰落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王符的时代，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皇权旁落，政局动荡，社会衰败。受经学思潮的影响，王符的主导思想属于儒家，正如汪继培所言：“王氏精习经术，达于当世之务，其学折中孔子。”（汪继培《潜夫论笺·前言》），王符的思想深深打上了经学时代的烙印。在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之后，经今古文学渐趋融合，许多经学家表现出了今古文经学兼通之势。特别是在王符学术活动的和、安、顺、桓年间，儒生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严格地固守家法师门，对今古文经学采取兼容的态度，王符亦如此。刘文英就指出：“从《潜夫论》的内容来看，王符确实对‘今学’‘古学’双方均有所取，而采取一种融合而用的态度。”^[6]《潜夫论》虽大量称引儒家典籍，融通今古文经，但王符并非简单地进行经意解说和章句训诂，而是用儒家典籍直接剖析社会弊病，“指讫时短，讨谪物情”（《后汉书》本传），从而使他成为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先锋。

就《诗》文本而言，《潜夫论》多采《鲁诗》说。^[7]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也将王符归入《鲁诗》学派，而且“从王符的为人到其《诗》学观点以及其现实批判精神来看，确实像《鲁诗》学者的作风”^[8]。《鲁诗》之外，《潜夫论》还采用了《齐

《韩》《毛》三家诗义，其标准是“依需所取”，在不同主题的论述中，根据说理需要，对各家诗说融合而用。譬如《论荣》：

夫令誉从我兴，而二命自天降之。《诗》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潜龙未用，或亢龙在天，从古以然。^[9]

“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出自《邶风·北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解说是：“引《诗》以明修身俟命之义，盖《鲁》说如此。”^[10]也即王符文中对诗句的引用，是采用今文经《鲁诗》的说法。

王符引《诗》不拘一格，根据论说需要，有同一诗句在不同篇章语境下今古文不同者。如对《诗经》“莫肯念乱，谁无父母”句的引用，《爱日》云：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聪明智虑，未必暗也，患其苟先私计而后公义尔。《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无思乎！^[11]

《释难》云：

且夫一国尽乱，无有安身。《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言将皆有害，然有亲者忧将深也。是故贤人君子，既忧民，亦为身作。^[12]

《爱日》《释难》篇同时征引了《小雅·沔水》“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一句，王先谦释义云：“言乱之既生，有父母者其忧更深，谁无父母，坐视乱兆而不肯一留念乎？

言人尽放恣，大乱必成。王符用《鲁诗》，是《鲁》义如此。其《爱日篇》亦引此二句，患公卿苟先私计而后公义，谓其不肯忧国，则又与《毛》义合。”^[13]可见，按照王先谦对诗义的解析，王符在《爱日》中用《毛诗》义，在《释难》中用《鲁诗》义。陈乔枬也指出，《释难》篇所引为《鲁诗》义，而《爱日》篇所引义与《鲁诗》异。^[14]造成诗义不同的原因，就是王符出于明理议政的需要，选择最能突显自己思想的那一家，不以今古文为限。

（三）引《诗》中典故与故实

汉代文学作品有巧妙使用《诗经》中典故与故实的传统。如秦嘉《留郡赠妇诗》：“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15]诗中既引用了《卫风·木瓜》的故实，增强了诗旨，又在诗歌意象上引用“木瓜”与“琼瑶”，这在思想感情上将二者巧妙地融而为一，表达了诗人对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再如班婕妤《捣素赋》：

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16]

文中接连引用《诗经》中多个故实，其中“幽闲”“贞专”暗用了《周南·关雎》毛传“窈窕，幽闲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17]的话。“首疾”出自《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一句，《采绿》与《东山》又是《诗经》之篇名。通过系列征引诗中典故与故实，不仅使赋作语言更为典

雅，而且也使赋作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汉代文人的引《诗》实践深深地影响了王符的创作理念。《潜夫论》中就有许多征引诗中典故与故实的实例。如《救边》：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来享，普天思服，行苇赖德。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18]

“行苇赖德”典出《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意在阐明君主的恩德普惠四方百姓，如今对边地人民遭遇的苦难不能置若罔闻。再如《遏利》：“白驹、介推遁逃于山。”这是对《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一句的暗用，喻指贤人遁逃隐居于山谷。《本政》“皇父、蹶、踬聚而致灾异”是对《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楫维师氏”故实的引用。又如《班禄》：

其后忽养贤而《鹿鸣》思，背宗族而《采芣》怨，履亩税而《硕鼠》作，赋敛重而谭告通，班禄颇而《硕甫》刺，行人定而《绵蛮》讽，故遂耗乱衰弱。^[19]

《鹿鸣》出自《小雅》，表达了诗人对德才兼备者的思念和钦慕；《采芣》出自《召南》，说明尊敬先人、祭奠祖先的特殊价值；《硕鼠》出自《魏风》，抨击了朝廷官吏向百姓收取苛捐杂税的罪恶。“谭告”指《小雅·大东》。《毛诗·大东序》云：“《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20]《硕甫》即《小雅》中的《祈父》篇；《绵蛮》出自《小

雅》，讥讽了那些没有仁爱之心的臣子。本篇引诗仅出现篇题，数句中连用《诗经》典故和故实，可谓言简意赅，内蕴丰富，表现力极强，有力地佐证了观点。这样的事例《潜夫论》中还有多处。

通过《潜夫论》对诗文本的征引，可知王符对《诗》、诗教、诗学及古代文化有很高的修养。行文中引《诗》已成为王符创作的一种通例，其原则就是以述志抒情为导向，根据针砭时弊和议政的需要，随机加以征引，以此来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和公信度，并与行文内容浑然一体。就具体引《诗》数量而言，《潜夫论》以《雅》为主，《风》《颂》次之，这主要是因为《雅》的性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为作者揭露、批判社会弊病提供了方便。更为重要的是，《雅》诗作者多是王公贵族，很多诗篇就直接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生活和历史，并对其作了毫不留情地讥刺，王符引这类诗会减少歧义，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用诗旨归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王符有着深厚的诗学修养，且在引《诗》上遵循着一定的原则，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个性。实际上，“五经”在内容、话语和叙述模式等方面有诸多差异，它们有着各自的语境，这便是汉儒因事择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皮锡瑞所言“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治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21]，这也是不同时期不同经典受到历代君王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汉代，《诗》被广泛用在

了政治教化之中，以礼教为旨归。长期以来，《诗》成了宣扬政治教化的工具，如王吉以《诗》谏昌邑王刘贺，刘向以《诗》谏成帝等。《潜夫论》打破了当时的用《诗》模式，将《诗》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使用《诗》表现出了更多元的旨归。

（一）以《诗》证理

诚如上述，汉代儒生往往以礼教为用《诗》旨归，而王符却独具匠心，不囿于经学的束缚，常引《诗》来论证观点，说明事理。如《三式》：“《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观之，未有得以无功而禄者也。”^[22]文中引《魏风·伐檀》中的诗句来说明，君子是不白白接受俸禄的，凡是有功德、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就应该封以列侯、赐予封邑来褒奖他们。相反，对于那些无所事事，毫无功绩的大臣高官，就应该免去他们的俸禄，必要时施以刑罚。

《潜夫论》引《诗》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常从论说需要出发随机引《诗》为据，阐发己见。如《贤难》：

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后人犹不能革，此万官所以屡失守，而天命数靡常者也。《诗》云：“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23]

自古贤人为难，好人难做。王符为贤人的遭讪遇害打抱不平，并指出贤人之所以“虽有贤材美质，然犹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的主要原因是君主昏庸，不能明察。在举例三代覆灭的事实之后，王符用《小雅·节南山》中的诗句来说明君主的英明与

否对国运的影响。引《诗》自然贴切，前后语义连贯，无丝毫强拉硬扯的感觉。

《潜夫论》引《诗》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在引《诗》后紧接着对《诗》句的内容和主旨进行精辟地概括和解释，进一步阐发诗义，以期使所引之《诗》能更好地论证事理。如《三式》：

传记所载，稷、高、伯夷、皋陶、伯夷，日受封土。周宣王时，辅相大臣，以德佐治，亦获有国。故尹吉甫作封颂二篇，其诗曰：“亶亶申伯，王缙之事，于邑于谢，南国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乐土，赐以盛服也。^[24]

王符特别重视臣子和诸侯王的德行，如果以礼仪道德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而获得了太平安宁，国君就应赐予他们封地和财物。“亶亶申伯，王缙之事，于邑于谢，南国于是式”出自《大雅·崧高》；“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出自《大雅·蒸民》。王符在引《诗》后根据所谈话题，紧接着对诗义作了凝练与解释，阐明了申伯、仲山甫以礼仪道德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天下太平的伟大功绩，与前文照应，浑然一体。

（二）以《诗》明教

中国古代一直有“以《诗》明教”的文化传统，孔子就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在一个人的人生修养和社会交际中具有重要作用。先秦时期在说《诗》、引《诗》

的过程中，存在“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25]汉代文人加以承继，王符引《诗》就具有明显的“以《诗》明教”的特点。如同公羊学者在尽力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样，《潜夫论》引《诗》也尽力发掘诗中所隐含的所谓“美刺”意义，这是王符对先秦时期“以《诗》明教”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潜夫论》直接引《诗》当中，大多以“《诗》云”“《诗》刺”“诗曰”“《诗》美”“《诗》讥”“《诗》伤”“《诗》痛”的形式开头，相较注重诗句或诗篇有关先王道德叙说的历史意义，王符更加关注由先王道德美名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强调《诗》的政教功用，这同秦汉人对《诗经》功用价值的认识是一致的。刘立志就说：“在秦汉人看来，《诗经》是先王典则，体现的是圣贤遗迹，后又经孔子删削，微言大义更是满眼皆是，他们首先看重的是《诗经》具有史诗的特质。诗歌与历史一样，都是言治的载体，都可用作政治讽谏与王道教化的工具。”^[26]如《述赦》：“《诗》讥‘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边议》：“《诗》痛‘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德化》：“《诗》美‘宜鉴于殷’‘自求多福’。”《交际》：“《诗》伤‘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等等，都具有丰富的教化功用。

在明显带有《诗》教功能的引《诗》之外，还有一些是诗文本所具体包含的。

如《巫列》：

由此观之，德义无违，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板板。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言人德义美茂，神歆享醉饱，乃反报之以福也。^[27]

人的吉凶祸福与德行善举相联系，德义茂美，鬼神就会降福于人。王符引《诗》对祖先敬奉鬼神，德义高尚的行为作了颂扬，就是要借言先人的美德达到明教的目的。

总之，《潜夫论》所引之《诗》，不是关乎政事就是有涉教化，极少例外。其引《诗》注重政治的作用和教化明理的意义，强调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最终将《诗》与社会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但推动了儒学的发展，而且也奠定了王符在《诗》学史上的地位。

（三）以《诗》论政

《潜夫论》的一个重要主旨就是同情民瘼，抨击东汉王朝，挽救时弊。王符引《诗》多关涉政治，常借助于《诗》中圣君贤臣的形象和事迹揭露和批判东汉王朝的弊政乱俗，其言辞可谓字字珠玑，入木三分。罗宗强指出：“诗的产生既在很大成份上出于实用的目的，诗的早期流传也主要借助于实用。”^[28]如用于宗教祭祀、禳灾求福等。在王符的时代，《潜夫论》引《诗》也多出于实用，大多数与政治和史事有关，便于引申发挥，影射时政，可作为立论的依据。如《爱日》：“《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将父。’言在古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29]王符用《小雅·四牡》中的诗句来说

明，古代王事繁杂，没有穷尽，以致百姓没有空余时间来奉养父母，躬行孝道。文中巧用诗义批判了当朝统治者不爱惜百姓的劳动时间，官僚随意侵扰百姓，耽误民时的行为。

王洲明指出：“王符批评当时的思想武器依然是以‘经’为准则，所以文中引‘经’的内容很多。”^[30]王符与汉代儒生在具体论事时的引经不同，把经典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思想与精神，熔铸于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诗》作为“五经”之首，王符在对东汉王朝进行暴露、批判的情况下，时时将其作为论政的媒介。如《爱日》：“《诗》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伤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禄，而曾不肯察民之尽瘁也。”^[31]王符借用《小雅·节南山》中的诗句来抨击三公大臣位居尊位，享受厚禄而不肯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对东汉弊政作了拷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当时盛行的今、古文经学，他（王符）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打破门户之见，吸收其中有益的思想营养。但他吸收前人的思想，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用来批判现实，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32]。《潜夫论》引《诗》旨归已突破汉儒以《诗》言教的单一模式，从现实政治出发，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借《诗》之情，抒己之愤，把《诗》运用于更为广阔的语境。

三、《诗》史价值

《诗经》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元典著作，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诗经》研究，既包括经典和精英思想的研究，又包括受到《诗经》影响的整个思想学术文化领域。《潜夫论》作为汉代的一部子书巨著，对《诗经》的接受、阐释和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据上文分析，《潜夫论》在引《诗》和用《诗》旨归方面都有别于当时的说《诗》模式，体现出了一些创新意识，这在《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一）用《诗》模式新变

《潜夫论》在引《诗》上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往往根据上下文论述的需要随机加以征引。刘毓庆、郭万金就指出：“王符以前的汉朝学者称引《诗经》，基本上是围绕着‘政治制度’与‘人伦道德’两大中心进行的，而王符则大大拓展了通《诗》致用领域，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不涉及。”^[33]同时，王符引《诗》也从自我需要出发，对诗句内容随意取舍，体现出较明显的“六经注我”倾向，为诗的引用开创了新的模式。如《赞学》：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34]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小雅·车辖》，原诗本指即将迎娶女子德行的美好，王符用来指圣人德行的高大，后人因而也常用这句话来赞美那些值得学习的人的德行，这不能不说王符是有开创之功的。“日就月

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出自《周颂·敬之》，诗意本指告诫群臣要严于律己，王符在上句诗意的基础上指出人要想学有所成，就必须从师学习。惟如此，方能不断积累知识，成为见解非凡的圣明之人。

在直接征引或间接化用诗句之外，王符文中还用《诗》题明理，在用《诗》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如《交际》中引《鸛鸣》：

所谓平者，内怀《鸛鸣》之恩，外执砥矢之心；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35]

《鸛鸣》指《诗经·曹风·鸛鸣》，王符用鸛鸣（布谷鸟）喂食其子平等如一的思想，论说人际交往中的持平如一，不偏不倚。引诗题高度凝练概括，意蕴丰富。

从《潜夫论》的用《诗》模式可以看出，王符对《诗经》烂熟于胸，故常化诗中语句于行文之中，而不露痕迹。在引《诗》、用《诗》上极其灵活多变，其基本准则就是“六经注我”。

（二）《诗》通学之勃兴

经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化，西汉经学尚专，并将通儒诵经作为选官择人、入仕为官的唯一途径。经学与官员遴选制度紧密结合，成为知识分子从政的工具，更使经学成为牢不可动的学术大厦。官府选拔出来的太学博士大都精于专经，并由专经教授弟子，且弟子要严格恪守师门家法，仅有极少数高才兼通数经，如韦贤、董仲舒、王吉等人。到了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的变革，今文经

的衰弱，古文经的兴起，加之师法家法的打破，兼通数经的儒生越来越多，如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后汉书·郑兴传》）。

《潜夫论》体现出的经学思想尚博，融古今诸家于一体。如《书》，《潜夫论》主要引用今文《尚书》，也有少数引用古文《尚书》的情况，甚至有今古文交错使用的地方。^[36]对于《春秋》经的解释，王符主要采用古文说，有时也采用《公羊传》的说法。就《诗》而论，王符主要用《鲁诗》说，同时也兼采《毛诗》《韩诗》与《齐诗》说，这足以表明王符于《诗》，已经是通学了。刘立志指出：“东汉后期之《诗经》学，也呈现出宏通趋势。”^[37]王符之外，还有许慎、张衡、马融、郑玄、赵岐、应劭、仲长统等，都表现出了《诗》通学的倾向。再之后《诗》通学成为主流，如贾逵精通《齐》《鲁》《韩》《毛》四家诗，并受章帝之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后汉书·贾逵传》）；郑玄以《毛诗》为主，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写成《毛诗传笺》等。王符《潜夫论》引《诗》论事与化用《诗》中语句者，居于东汉后期诸家之首，融古今诸家《诗》说于一体，实是《诗》通学勃兴的代表。

（三）《诗》学史料意义

《潜夫论》在引《诗》上很有特色，对四家《诗》都有征引，其中有许多与今传本不同，这对于我们考索汉人所见之《诗》学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如《赞学》“《诗》曰：

‘题彼鹄鸪，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利用《赞学》中引《诗》“题彼鹄鸪，载飞载鸣”来证明《鲁诗》中“题”应作“相”，“脊令”应作“鹄鸪”（《毛诗》中《小雅·小宛》作“题彼脊令，载飞载鸣”），王氏具体考证如下：

鲁“题”作“相”，“脊令”作“鹄鸪”者，《释鸟》：“鹄鸪，雝渠。”郭注：“飞则鸣，行则摇。”《汉书·东方朔传》《答客难》曰“王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鹄鸪，飞且鸣矣。”《中论·贵验》篇：“诗曰：‘相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迁善不懈之谓也。”陈桥枏云：“《中论》说《诗》与东方生语，皆述《鲁》义。‘脊令’当作‘鹄鸪’，《鲁诗》之文然也。‘题’鲁作‘相’，‘相’亦‘视’也。”《潜夫论·赞学》篇：“《诗》云：‘题彼鹄鸪，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王亦用《鲁诗》，仍作“题彼鹄鸪”，疑后人顺《毛》所改耳。^[38]

《潜夫论》中对《鲁诗》的征引为王先谦的论证提供了重要证据，再参以众家，使整个论证逻辑严密，颇具说服力。再如《交际》中引《诗》：

恩有所结，终身无解；心有所矜，贱而益笃。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世隘然

后知其人之笃固也。^[39]

王符对《诗经·曹风·鸛鸣》中诗句的引用、说解与刘向在《列女传·母仪篇·魏芒慈母传》《说苑·反质》中所引同。刘向为《鲁诗》学者，宋代范处义《逸斋诗补传》卷六就说：“《鲁诗》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刘向乃交之孙，其说盖本《鲁诗》。”可知王符引诗应属《鲁诗》。

在具体诗篇的解说上，《潜夫论》引诗有与《毛诗》迥异者，这对我们了解汉代诗说的演变具有一定价值。如《德化》：

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萋萋。”……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化者乎？^[40]

引诗见《大雅·行苇》。《边议》中说“公刘仁德，广被行苇”，《文选》收班彪《北征赋》亦云：“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可以看出，王符同班彪都认为《行苇》一诗是赞美周先祖公刘的，但《毛诗序》的解说是：“《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耆，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41]王符说诗与《毛诗》显异。

《潜夫论》引《诗》在考订一些《诗经》篇目的作者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如《遏利》中关于《桑柔》作者的记载：

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

隧；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42]

《大雅·桑柔》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在谈到《诗经》中作者可考之作时，学者们也不提及《桑柔》，甚至有学者认为芮伯（即芮良夫）所作不可考。这些都是无视文献记载的论调。早在《毛诗序》中就说：“《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云：“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43]《左传·文公元年》也载秦穆公对秦大夫及左右说：“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罪。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孤之谓矣。”^[44]《遏利》的记载与《毛诗序》和《左传》中秦穆公所引之《诗》一致，虽说的比较笼统，但至少明确指出《桑柔》是芮良夫劝谏厉王之后而作，其史料意义不容置疑。关于具体的作时，赵逵夫从诗文本所反映的事实入手，考证认为：“《桑柔》一诗应作于厉王三十七年（前842年）。”^[45]

《潜夫论》还保存了一些失传的《诗》说。如《巫列》：“故《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板板。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言人德义茂美，神歆享醉饱，乃反报之以福也。”《爱日》：“《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将父。’言在古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以上引《诗》分别见《周颂·执竞》和《小雅·四牡》，其说《诗》旨意均不见于他书，唯《潜夫论》所独有。

此外，《潜夫论》引《诗》在研究和考

证《诗》今古文经说方面也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德化》篇引《诗》句“方苞方体，惟叶杞杞”。“杞杞”今本《毛诗》作“泥泥”，《韩诗》作“芄芄”，《鲁诗》作“杞杞”。可见，王符所引本《鲁诗》。

综上所述，《潜夫论》引《诗》在史料价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重视。

参考文献：

[1]刘振东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0页。

[3]由于统计标准和方式不一，各家统计有出入。刘文英统计，《潜夫论》完整引用《诗经》44次。（参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刘毓庆、郭万金统计，《潜夫论》引《诗》共110处。（参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蒋泽枫统计，《潜夫论》引《诗经》共计111条。（参蒋泽枫《王符〈潜夫论〉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李晓敏统计，《潜夫论》引四家《诗》104次。（参李晓敏《王符〈潜夫论〉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62页）

[4]如李晓敏《〈潜夫论〉引“鲁诗”考论》（《楚雄师专学报》2012年第11期）、

白云娇《〈潜夫论〉引〈诗〉考》（《江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王硕民《论王符诗观念与实践》（《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

[5][9][11][12][18][19][22][23][24][27][29][31][34][35][39][40][42][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4页、第44页、第290页、第432页、第347页、第219页、第261页、第68页、第258页、第394页、第288页、第18页、第453页、第442页、第486页、第35页。

[6]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第278页。

[7]参李晓敏《〈潜夫论〉引〈鲁诗〉考论》（《楚雄师专学报》，2012年第11期）、王硕民《论王符诗观念与实践》（《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8][33]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第384页。

[10][13][38][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9页、第637页、第695页。

[14]参[清]陈寿祺撰，陈乔枬述《鲁诗遗说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15][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9页。

[16]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17][20][41][43][汉]毛亨传、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页、第296页、第386页、第417页。

[2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6页。

[25]参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26][37]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3页、第143页。

[28]罗宗强《诗的实用与初期的诗歌理论》，《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30]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32]张立文主编，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36]参拙文《王符〈书〉学思想探论》，《语文教学通讯》（学术刊）2018年第3期。

[4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16—517页。

[45]赵逵夫《芮良夫和他的〈桑柔〉》，《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5期。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赋比兴在西和乞巧歌中的应用

魏泽民 马 莉

摘 要：西和乞巧歌广泛使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以赋为主，赋中有比，比中有赋，“兴的比化”与“兴的赋化”的“原生态言说”最具特色。西和乞巧歌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民间化写作与口语化写作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赋比兴 西和乞巧歌 应用

甘肃陇南西和县历史悠久，文脉深远，是中国七夕乞巧的起源地，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历史久远、形态独特的乞巧风俗。2007年，西和县因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而获得“中国乞巧文化之乡”的称号。西和乞巧歌广泛使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以赋为主，赋中有比，比中有赋，“兴的比化”与“兴的赋化”的“原生态言说”最具特色。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子贤先生即已发现了西和乞巧歌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认为西和乞巧歌“同《诗经》中的诗有着同样的价值”，^[1]并着手搜集、整理与编辑西和乞巧歌，成为最早研究西和乞巧文化的学者。

一、赋

“赋”是民间叙事诗传统的表现手法之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赋者，铺

而言之。”郑玄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铺，即铺排，铺排包括排比，但不只是排比，其本质是指“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其二，“赋者，直而言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直抒胸臆”。其三，“赋者，叙列言之。”刘熙载《艺概·赋概》：“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对随时间而变动的事物进行陈述，多用叙；对因空间而不同的事物进行描绘，多用列。而赋所运用的，主要就是叙述和描写。从“赋”的这三种表现事实来看，成功的赋，往往极具一种艺术的感染力，能够描绘出作者对事物精细



的观察和生动的细节，细节让事实准确、生动而活灵活现。^[2]

赋是文艺创作中最为普遍、最重要的一种心化形态，是对事物直接的铺排性叙述和罗列性描写。赋最大的艺术价值就是让我们的言说最大可能地回到事实、回到客观、回到事物本身，让事实说话。明白于斯，才能理解看似“平铺直叙”的赋为什么那样真实有力。

出自南朝徐琳编撰的《玉台新咏·孔雀东南飞》，叙述了汉末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之妻刘兰芝为仲卿母所遣，最后投水而死的爱情婚姻悲剧。作品写到女主人公刘兰芝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时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但“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这是一种按时间铺排来构建诗歌的叙事结构，通过对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等生活细节的具体铺陈，产生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这种按时间式铺排来直陈诗者之情志的赋法在西和乞巧歌中也被广泛使用。

西和乞巧歌中大量使用上述《孔雀东南飞》中所用的年结构法，如《我娘生我一场空》：“正月里来是新生，我娘生我一场空。一岁两岁吃娘奶，三岁四岁离娘怀。五岁六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九岁十岁学纺线，十一二上学茶饭。都说针线最要紧，十三四上用了心。十五岁上媒人来，十六给人成在外……”歌词从女孩在娘家的成长历程说起，按年龄铺排叙事结构。

按月结构法铺排叙事结构的，诸如乞巧歌中的《正月十五提起话》：“正月十五提起话，二月十五把媒发。三月十五送彩礼，四月十五给人家……”，还有《朝里的文书连夜来》《死板姐》等；日结构法铺排结构的，诸如《热头出来一盆火》：“鸡叫头遍去推面，一面打盹一面转；鸡叫二遍把水担，路又远来桶又宽；鸡叫三遍要上坡，崖上山上砍柴火。喂牛喂猪蒸馍馍，抱上湿柴去烧锅……”

西和乞巧歌中还有一种“叙列言之”的赋法，采用“一先一后”地铺叙方式，诸如《石榴子开花叶叶青》：“石榴子开花叶叶青，女子娃长大要给人。大人把钱财看得重，巴不得早早送出门。大姐给到南门下，生意算账难不住她。二姐给到东门下，跟上提锤拉风匣。三姐给到水沟下，锤洋芋来把粉挂。四姐给到老庄里，学做大小炮仗哩。五姐叶家大路上，挂的挂面细如香。六姐王家磨下哩，做的豆腐大着哩。七姐给到姜席川，会

捻毛线会擀毡。……”直唱到八姐、九姐和十姐，这里所罗列的地名，都是西和县的地名；十个姐妹所从事的职业，都是过去西和人谋生的职事，地域色彩显著。

这种用时间铺排来构建诗歌的叙事结构的赋，在看似随意而为的意象组合背后，都有其鲜明的语义连贯性和生活逻辑，表现了起句和结句之间主体内容的丰富性。因为赋是敷陈其事，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它不用太多的艺术加工，只要直陈其事，直抒其声就能成篇。^[3]民歌中常用的这种赋法，甚至影响到当代诗歌的叙写与表达，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写到大堰河去世之后，作者用“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大儿做了土匪，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第三，第四，第五，……”，诗人不厌其烦，用最简单的方式，干净纯粹的语言敷陈其事，藉此凸显大堰河之于她的家庭的重要性和大堰河的死给她的家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这种“赋”有直接倾诉，直言其事的特点，诗人才会以赋为诗，剔除了过度的修辞，客观上避免了滥用修辞格对原生语言和质朴情意的伤害，用最干净最纯粹的原生态



的语言吟出了肺腑之声，用直白质朴的原生态语言极其准确地捕捉生活细节，在平实的叙述中直接表露炽热感情，细节让事实准确、生动而活灵活现。

“‘赋’是‘直说’，也可凭借着感性的材料，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具体、形象、生动地叙事、状物、写景、描人、抒情。”^[4]西和乞巧歌中那些直白质朴的言说中就有着对细节极其准确的把握，如“妇人一听牙一毗，男人说是骗她的”“干垄上面刨一把，说声亲哥你坐下”“哥哥一听也伤心，拿了手背揉眼睛”“大路上走到张庄里，都看我的鞋帮哩”“说话要比葡萄甜，赶快拐上把家还”，朴素而形象，真切而生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丰富的内容，细致的描述，准确全面地叙写了旧时代西和女性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口语诗歌的代表作家于坚先生才大声呼吁：诗歌创作要“拒绝隐喻”，要让诗歌回归民歌那种干净的纯粹的原生态的语言状态中去，让诗人“喊出自己的诗，从生命深处爆发自己的诗——而不是伪饰与作秀。”^[5]

西和乞巧歌以赋为主，但并不排斥修辞手法的运用和修辞的表达效果，比如正反对照式的赋法与顶针式的赋，其本身就是一种修辞。

正反对照式的赋法，最典型的要数卜巧歌《我给巧娘娘许心愿》：“我给巧娘娘许心愿，巧娘娘给我赐花瓣。巧了赐个花瓣儿，不巧了赐个鞋扇儿。”中间依次列出扎花针/锈铁钉、九华灯/烂葱根、扎花线/背篋祥、

铰花剪/挑草铲、擀面杖/吆猪棒、写字笔/打牛的、笔和砚/烂瓜蔓、织锦的缎/提水的罐、翠花簪/牛鼻圈、扇子扇/老木锨、锦香袋/烂锅盖、花儿戴/小白菜等十二组意象，这些意象全部按“巧了赐个……，不巧了赐个……”的结构一正一反排比开来，最后以“巧娘娘给我赐花瓣，照着花瓣了心愿。巧娘娘给我赐吉祥，我给巧娘娘烧长香”结束全诗。

顶真式的赋法，比较典型的有《一碗凉水大家喝》：“提了笼笼才下坡，迎面碰着个学生哥。学生哥哥你咋啖？提着书笼上学啖。三天上学两天念，一天城里买笔砚。笔砚买到笼儿里，学生哥要戴顶儿哩。要戴顶儿要作官，二郎坝里收银钱。银钱收了串七八，要买金羊扇子啖。扇子搥烂没风了，想的样样落空了。……”使用顶真的修辞手法，使诗歌结构更加紧凑，语气更加连贯，充分展现了民歌质朴明快、通俗易懂的艺术特色。

西和乞巧歌以大量的纯粹赋法证明，在民歌创作中，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光用赋就可以独立成篇，可是光用比兴就不行，因为比兴离不开赋，用比兴创作的民歌都要靠赋来作底，要靠赋来点题、切题、破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赋”较之“比兴”更为重要。西和乞巧歌《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势成女子不如人。四岁五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十一二上不出门，媒人登门问行情。六尺花布一瓶酒，打发女儿跟着走。侍候阿家把花扎，挨打受骂养娃

娃。只让喝汤不给饭，一点不对让滚蛋。……”全歌第一句兴起之后，接着就是作者对自己人生命运的诉说——直到最后一句“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几乎全是赋，几乎全在高扬着赋的力量！

如果说“赋”是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中的三个相辅相成的要素。^[6]

二、比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通过以类比为原则赋予外物以意义的活动，人把自己与万物联系起来。他不断地把主体对象化到客体之中，又把客体同化到主体自身之中。自然事物对人不再仅仅是只有简单功利关系的东西，人的环境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宇宙。人与外界事物成了朋侣、熟人，或敌人、对手——不管是哪一种关系，他同外物之间有了一种活生生的、可以交流的联系。”具体而言，“比是运用对比或比拟或比喻的一种诗歌的表现手法”^[7]。“以比为诗”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手法，主要是指“以比喻手法为诗”，在比喻的本体、喻词和喻体中，喻体是绝不可省也绝不可以代替的，因为喻体的属性决定着整个比喻的属性，喻体是比喻的生命所在。^[8]

西和乞巧歌广泛地使用了比的手法，但

又不同于传统民歌中的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喻体的本土化与生活化。喻体的本土化与生活化指的是所用喻体为歌者自己生活中近取诸身的事物。人们生活环境的不同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物象世界，而物象世界的不同也形成了人们头脑中不同的表象世界，不同的表象世界自然就决定了人们在艺术比喻中所用喻体的不同：“傣族喜用孔雀、花朵、露珠、宝石、水果等作喻体，藏族则多用风雪、岩石、高山、猛兽、牲畜等作喻体，展现了不同的生存环境、人生态度和民族性格。”^[9]于是，近取诸身地使用本土化生活化的喻体，就成了民歌比喻最为精彩也最为质朴的地方，这也是民歌艺术力量之所在。在西和乞巧歌里，原生态的比喻比比皆是，如“一天纺了四五斤，老娘一听开了心。拿过一看没好气，拴牛的麻绳比那细。”再如“杏核儿眼睛圆又圆，线杆儿鼻子端又端。”又如“那家的儿子锤头大，立到一起算个啥？”（锤头即拳头，过去童养媳总比丈夫要大些，因为娶过来主要是为了干活）等等。这些喻体都是西和乞巧歌中生活化的原创性的意象。大量使用生活化喻体，使西和乞巧歌中的比喻不仅显得朴素无华、情感真实、含蓄内敛，而且乡土味十足，地域色彩浓郁。

二是喻体的概念化与世俗化。太乡土太生活化的喻体往往会走向世俗化和概念化，诸如“按下的牛头强扭的瓜，女子娃婚事由不得她”；“母以子贵古人言，靠儿把娘的枷

锁搬”；“说话要比葡萄甜，赶快拐上把家还”；“大姐力猛虎生风，二姐高起龙翻身。三姐轻飘鹰点水，四姐长裙龙摆尾”；“一着枪子儿就爬下，大刀一砍像切瓜”；“帽盖子后面要长虫，瓦眉儿上下像搨风”；“身体端得像竹杆”等等，大量使用常见的甚至非体验性的喻体来进行说明性的而非表现性的比喻，这些比喻大多打上了浓郁的封建色彩，特别是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观念，难免造成喻体的概念化和世俗化，缺乏艺术魅力。

西和乞巧在喻体的运用上，既有原生态质地的活泼质朴的生活意象，又有语出知识经验的、世俗色彩浓烈的概念化意象，这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西和乞巧歌这一俗文化的“非雅”特征。

三、兴

兴就是起事，用它物来引起此物。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说：“比显而兴隐，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诗人学者张远山认为：“‘兴’貌似修辞手法，但实际上不是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文体即思维方式。就其是一种思维方式而言，‘兴’类似于‘赋’。然而‘赋’是实用的、直接的，而‘兴’是非实用的、婉曲的。因此‘兴’是一种独特的诗歌文体，而且其独特性放诸世界文学之林，还没有同类可比物。”^[10]作为民歌标志性的起句方式，西和乞巧歌中的“兴”也具备一般民间歌谣的普遍特征：一是就起兴的句数来看，有一句起兴的，如“金蹄子花银蹄子花，女子许给商户家……”，也有两句起兴的，如“一碗凉水大

家喝，扎花的丝线各拖各。提上笼子才下坡，迎面碰着个学生哥……”。二是一物多兴，如“豆芽芽，麦芽芽，把愿许给巧娘娘。根根豆芽根根线，大红绸子缠一转。金芽芽，银芽芽，今几个献给巧娘娘。今几个桌上献一献，黑了掐着想心愿。”间接反复，语义回环。三是一兴多用，如送巧歌中的“白手巾绣的是水仙，一股子青烟升了天。白手巾绣的一枝兰，再也见不上巧娘娘面。白手巾绣的竹叶梅，巧娘娘一年来一回……白手巾绣的芍药花，巧娘娘一走想死家。白手巾绣的葡萄蔓，巧娘娘一走心想烂。白手巾绣的莲花台，今年去了明年来……”，形成排比句式，结构整齐和谐，更便于抒发人神离别之情。四是有兴起也有兴结，如送巧歌之一的：“白手巾绣的牡丹花，巧娘娘走了我咋家？有心把巧娘娘留一天，害怕桥拆了没渡船。有心把巧娘娘留两天，害怕走迟了天门关。有心把巧娘娘留三天，害怕老天爷寻麻烦。有心把巧娘娘留四天，留不下来了也枉然。白手巾绣的苦瓜子，想留巧娘娘没法子。”在兴起的同时，又用大致相同的起兴句来结束歌唱，兴起又兴结，首尾呼应，极具艺术感染力。

西和乞巧歌最突出的特点大概要数“兴的比化”与“兴的赋化”。纯粹的兴往往不带比，诸如“枣儿树上结枣哩，向阳人家坐巧哩”“罐罐里煮的白胡麻，我给巧娘娘梳头发”“正月里来是 newPos，我娘生我一场空”“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势成女子不如人”等，这种兴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兴之状态，

兴起之句和被兴之句之间构成一种“他物——此物”的起兴关系，两句之间几乎没有连贯的语义。但是在西和乞巧歌里，更多的是兴被“比化”，如“一样的金子十样的银，女子不如儿子疼……”句间有一种暗喻关系，则它又成了“比兴”——兴中带上了比。

“比兴”常常由暗比即隐喻形成，如果起句中出現明喻，就会中断了上下句之间的起兴关系，整个句子就成了赋。如西和乞巧歌中的“热头出来一盆火，放下纺车摘豆角”，“一盆火”的出现，让整个句子成为了写实性的描写——“表现”变成了“呈现”，这种现象就是“兴的赋化”。

关于兴与赋的关系往往貌合神离，或者貌离神合，因为兴往往以铺陈其事的面目出现，十分地接近赋的写实。但“写实与否，不是区分‘赋’和‘兴’的标准。写实可以起兴，不写实也可起兴。例如《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句，相对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来说显然是他物，是写实，单独看，它就是“赋”，合观其后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又成了“兴”。^[11]

西和乞巧歌中的“热头出来落西方，吃



过黑饭进绣房”“头上的豆儿脚下的瓜，妹妹坐下来扎花”，如果单独看第一句话，似乎应该是兴，但是同下一句合起来看，却又是赋，这就是兴的赋化。这种现象最大特点就是歌者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从眼前物眼前景出发、在自然的状况下自然地起兴，用眼前景物为题材，如“豆芽芽，麦芽芽，把愿许给巧娘娘。”面对着眼前盆子里的豆芽儿，她们随眼一看随口即唱，将歌者的生活直接带入歌唱，增强了歌唱的真实性现实性以及朴素之美，又生动传神地写照着她们自己的生活。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样的生活中就用什么样的眼前之物来起兴，这正是民歌的本色。

这种似兴实赋，亦赋亦兴的“兴的赋化”现象应该是兴的手法中最为本质也最具艺术力量的兴法，它告诉我们：好的兴不是带比的兴而是带赋的兴，好的兴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而不是从书本或者知识或者概念中来的。如果说一般的比总是由心及物，总有理性的成分在其中，那么这种由物及心、任物载心、物径载心的现象，就超越了比而接近于赋，虽然也借用了物，但是这个物来得是那样的漫不经心，自然而然，可以说是借用了他物，却等于没有借用他物，而赋正是这种不借不用、即物即心的方式才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所以用好赋这一表现手法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参考文献：

[1]赵子贤纂著.赵逵夫校订.西和乞巧

歌[M].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5。

[2]朱飞镒.云南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赋比兴手法的运用[J].和田: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韦桂喜.赋与民歌[J].石家庄:大众文艺(学术版).2010年07期。

[4]黄霖.赋比兴论[J].厦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06期。

[5]薛世昌.原生态言说与西和乞巧歌的赋比兴研究[J].兰州.兰州学刊23011年04期。

[6]陈雪雁.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J].昆明.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02期。

[7]庄小虎.“兴”的追溯与定性[J].南通:南通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03期。

[8]薛世昌.原生态言说与西和乞巧歌的赋比兴研究[J].兰州:兰州学刊2011年04期。

[9]朱飞镒.云南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赋比兴手法的运用[J].和田: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10][11]张远山.从赋比兴到整体象征[M]//张远山.汉语的奇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08。

(作者单位：魏泽民，甘肃陇南西和一
中；马莉，甘肃陇南西和县西峪学区)

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建制始末及作用

张益明 张雅淇

摘 要：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存续期为1942—1946年，控制管辖区域为甘绥宁三省和陕北地区，认真研究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的建置始末，对研究旧中国地方海关历史和抗战时期甘肃及西北经济形势、物产、贸易、政局等情况有所裨益，对建设新时期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和全球统一的验估制度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抗战时期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 建置及作用

1940年，国民政府为控制与军事有关的国产物资出口，在各战区设置货运稽查处负责货物稽查工作，始设冀鲁豫、晋陕、湘鄂、苏浙皖赣、广东、广西六个战区货运稽查处。1941年增设甘宁绥区，将苏浙皖赣分成苏皖赣和闽浙两区，最终形成8个战区货运稽查处，分别设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湖北老河口、广东曲江、广西桂林、甘肃兰州、江西上饶及浙江江山等地。1943年，重庆总税务司署在大后方各地以及与沦陷区交界的地点设置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对往来沦陷区与内地的货物进行检查，以阻挡敌占区货物内流及内地物资外流。当时在甘肃境内设置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地点为：平凉、兰州、天水。抗

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后，日军南进，西南国际交通受阻，军运频繁，货运受阻，关税损失严重，国民政府谋求在西北加大税收征管，筹划建立以兰州为西北中心的大后方基地，保证东线和南线战争物资资源。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开始调整海关布局，兰州海关总税务司公署开始筹建。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在1942年工作计划记载：“自战争延长，日军南进，国际交通受阻，加之军运频繁，货运停滞。本关税收自必大受影响，惟仍拟尽可能力量与方法，在西北边区增裕税收”^[1]。

一、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成立始末

1. 兰州关税务司公署机构设置

1941年12月25日，根据国民党中央财

政部电令，财政部开始将各战区货运稽查处改组，海关统一接收。1942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关务署将“甘宁绥货运稽查处”改为“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关务署海关总税务司署，1942年1月10日正式办公。建关初期，有内勤人员65人，外勤人员59人，工役人员59人，共计183人。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设立总务课、秘书课、会计课、不管课等内部管理职能部门，设有监察长负责内务监察处理，设验估员从事海关估价鉴定。当时，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关区范围包括甘宁绥三省，办公地点在兰州市小北前街8号（租用兰州货运稽查处旧址）。海关人员一部分由总署抽调，一部分就地招聘或接受原货运稽查人员充实。1942年3月13日，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致兰州海关税务司训令中称：“兰州关现已成立，自应在绥省货运冲繁地方酌设分关、卡、所，以便管理商业，防止走私”^[2]。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接收甘宁绥货运稽查处后，开始逐步建立以兰州为西北中心的海关管理系统。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一边电请总税务司署选配海关专业人员担任总关课长和各分卡主任，一边就地招聘或选用原货运人员在各分关和支关开展海关业务工作。如《兰州关派往各水陆统一检查所执行货物检查人员姓名祥历表》显示，前期派往平凉分卡的陈启才为一等副监察员（上海复旦大学肄业，先后在江汉、

拱北、昆明、金陵、兰州等地任稽查员、监察员等职）；助理傅长学，未列等稽查员（西北师范学院先修班肄业，曾任兰州关稽查员）；派往兰州的王承训为二等监察员（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毕业，曾任江海、九龙、厦门、青岛、昆明等关关轮署船长等职）；助理于成章为试用本口稽查员（毕业于国立兰州师范学校，曾任兰州关稽查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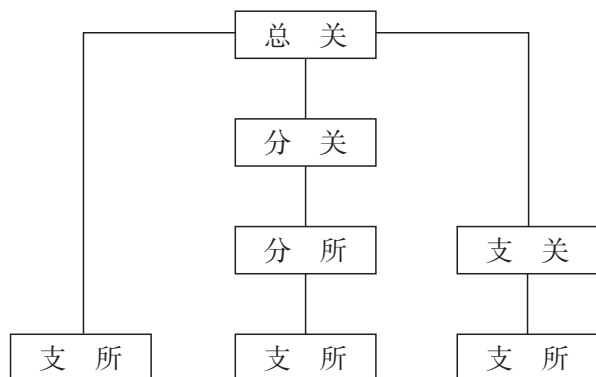
1942年9月，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根据民国海关总税务司署训令，委派王作民前往陕坝筹设绥远分关，接收绥远省政府贸易管理处，征收塞北关税。1942年9月16日，绥远分关成立，为“兰州关绥远分关税务司”，设有陕坝、五原、普克提、东胜（后改为六井）4个分所。1943年5月，金丽鸿被任命为兰州关税务司副税务司，绥远分关主任，当时绥远分关共有职员23人。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成立时在甘肃省设立的分卡（后改为分所、支关、支所）有：天水、徽县、岷县、殪虎桥、碧口、平凉、固原、西峰镇、张掖、武威、酒泉、张家川、阎家店共13处。兰州市内设立的分卡（后改为分所、支关、支所）有：邮包税处、黄河桥、西稍门、公路车站、东岗镇、河口6处；在宁夏设立的分卡有吴忠堡、宁夏2处，为兰州关税务司公署所属支关；在绥远分关设立的分卡有五原、陕坝、东胜（后改为六井）、普克提4处，后又增设榆林分卡。1943年5月，海关总署税务司梅乐和（英国

人)致电青海省政府,拟在青海省增设管卡一个,征收战时消费税,要求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派人进行实地调查,计划在青海省西宁市设立西宁分卡。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派一等监察员郑建勋前往对西宁货源及税收进行调查,海关总税务司署与青海省地方政府也多次协商未果。

海关总税务司署于1943年12月20日颁布通令,规定自1944年1月1日起,直属总关的独立机构称为支关;直属分关的独立机构称为分所;与总关或分关同在一地并直属各总关或分关的机构称为支所;直属支关或分所的机构,无论是否与该支关或分所同在一地,称为支所;所有驻邮局包裹税征收处、驻机场稽征所及参加统一检查的稽查站等,均称为支所。改订后各关及其分支关所的系统见下图:

表1 1943年各关及其分支关所划分示意图



1946年6月初,国民党政府裁撤了设立四年多的兰州关税务司公署,其存续期为抗日战争后期(1942年1月至1946年6月),控制管辖区域为甘绥宁三省和陕北地区^[3]。

2.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历任税务司(长官)

1942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委任王作民为兰州关税务司公署代理税务司。1942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委派英国人班世法为兰州关首任税务司,王作民为副税务司。

班世法(英文名Bairnsfather, R. M. P. 1887—1959)。1920年12月以“四等帮办后班”职级在中国海关供职。1937年11月在雷州海关任代理税务司,1941年升任税务司。1942年调任兰州海关税务司,与副税务司王作民精诚合作,接收原“甘宁绥货运稽查处”,成立“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任期内在甘肃省境内设立海关支关13处,兰州市设立支关6处,宁夏和绥远省境内设立支关6处。班世法从粤港及江浙地区选调海关专门人才或就地招聘大学生任支关负责人,短期内完成“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组建。执行海关总税务司署各项命令,全面开展海关缉私、税收征管、海关估验和市场调查等主要工作。同时制订了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分关及各支关内务事项详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1943年5月,金丽鸿被任命为兰州关副税务司,绥远分关主任。1943年10月28日,王作民暂行署理兰州关税务司。1944年4月,刘邦麟代理兰州关税务司。7月,夏廷耀调离总署,接任兰州关税务司之职。1945年7

月23日,陈柏康就任兰州关税务司,直至1946年6月兰州关税务司公署裁撤。

表2 民国时期兰州海关公署税务司(长官)变动情况表

姓 名	国籍或籍贯	职 务	到任时间(年月)
王作民	辽宁	代理税务司	1942.1
班世法	英国	税务司	1942.5
王作民	辽宁	税务司	1943.10
刘邦麟	湖北	税务司	1944.4
夏廷耀	浙江	税务司	1944.7
陈柏康	广东	税务司	1945.7

3.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职能及关区海关业务

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的主要职能是税收管理、海关估验和查缉工作,兼顾辖区贸易状况分析。

(1) 税收管理。按照当时税则税率,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每年制定各项税收预算目标,分解到各分支关,列明完成进度,年底进行全面考核。当时征收税种主要为进口税、出口税、进出口关税附加税、进出口救灾附加税、转口税。同时,依据《战时消费税暂行条例》,重点征收“战时消费税”。

(2) 海关估验:主要包括调查、记录和审核。海关调查由总关总务科验估组向市场做出定期调查,作为编订估价表根据。各分卡(支关)随时派员向市场调查各种物价,每月将国货洋货价格造表报总关备考。海关

记录是为了防止海关调查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价格波动,有可能存在商民申报价格与价目表中有缺项或价格波动剧烈相差甚远的情况时,要随时记录以备查考。海关审查是对除由总税务司署审核的一些国货洋货物价表外,由各支关(卡)指定专人对税收和报关单凭据进行审核确认。

(3) 海关查缉:总关设立缉私分处,专门负责管理货物稽查工作。各分卡(支所)专门配备查缉人员与总关缉私分处联合办案,通力合作打击走私。主要办理辖区内查获走私案件、走私金银、走私军火、走私毒品等,及时出具查私报告,进行走私物品处理登记等。

(4) 贸易调查。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利用海关管理优势,直接或间接进行市场贸易调查分析,向海关总税务司署报告甘宁青绥等省时下经济形势和贸易状况。抗战时期在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辖区通过的货物以日常用品为主,其出产地多为甘宁青绥等地物产,如中宁枸杞、张掖红枣、武威羊毛、徽县药材等。主要有:甘草、当归、大黄、皮渣、蜂蜜、羊皮、瓜籽、羊毛、植物油、生熟皮、香料、皮统、毛毯、黄表、毛鞋、香草、枸杞、狐皮、羊毛毡、木板、木椽、鹿茸、贝母、党参、姜皮、花椒、清油、河南绸、大米、小麦、小米、糯米、胡麻子、菜籽、白麻、棉花、红枣、煤、发菜等。

除上述海关业务外,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对系统内养老、津贴、统计、医疗、物

资、内务、人事任免、舞弊查处、货物验收、税费上缴等进行全面系统管理。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所有政令均以海关总税务司署命令为准，不得自行颁布命令。在筹建阶段，总关无力视察各分支机构，仅对兰州市各卡（所）派驻高级官员就地视察，掌握情况。其后每年都派高级关员赴各地重点对年度税收和缉私工作进行考核视察，并出具业务考察报告和工作总述报告。

表3 1942年—1945年兰州海关税收表(单位:国币)

年份	进口关税	出口关税	战时消费税	合计
1942	478710	0	12007421	12486131
1943	1804100	569	17273979	19078648
1944	3462435	86.78	61369276.87	64831798.65
1945	4345855.8	0	10444229.7	14790085.5
合计	10091100.8	655.78	101094906.6	111186663.2

二、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成立始末充分说明了旧中国海关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基地。旧中国海关的发展脉络是从海关监督（户部管辖）和税务司（总理衙门管辖）二元制特殊模式向以外籍税务司垂直管理一统天下模式发展的产物，中央及各地海关税务司长官一直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把持担任^[4]。抗战时期民国总税务司先后由梅乐和（英国人）、李度（美国人）和周骊（英国人）担

任，兰州海关税务司由英国人班世法担任，重要岗位如监察长阿腾都也是英国人，其利益和价值取向在殖民利益上有极度的苟同性。他们虽然是国民政府的高级雇员，但是代表了英美利益。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1942年度工作计划中亦明确“海关各种法规向由总税务司以命令颁布遵行，各关无权自为更张”^[5]，旧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海关特征在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运作中表现得无完肤。

2.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建置研究对了解旧中国海关历史特别是抗战时期内陆海关发展历史不可或缺。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抗战时期存续期为1942年1月至1946年6月，全区管辖地涉及甘肃、宁夏、绥远和陕北地区。这些地区幅员辽阔，战略地位明显。抗战时期我国东部和南部沦陷期，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除与海关总税务司署紧密联系外，还与西安、洛阳、天津、长沙、闽海、瓯海等海关机构在人事、业务上密切配合，在保障税收、查缉走私和保障畅通中通力合作。1944年，兰州关税司代理税务司王作民受总税务司委托组建新疆哈密税务司署。1945年，兰州关税司夏廷耀受海关总税务司署指示前往西安查处西安税务司罗庆祥被控舞弊案，抗战胜利后，被民国政府派往接管台北海关，获国民政府行政院“治台有功”奖状。历任税务司班世法、刘邦麟、夏廷耀、陈伯康先后调往海关总税务司署任职。由此可见，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地位是重要的。

3. 加强对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的历史研究对海关业务建设和地方经济有所借鉴。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涉猎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建置的学术研究,由于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日常使用文字绝大部分是英文,受一定条件限制,许多重要的资料价值还没有充分挖掘发挥出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于西北地区经济贸易政策、税收货运、政府议事、政治军事、中药农产等分析报告,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度整理,为今所用,为我所用。如《兰州关及绥远分关三十四年(1945年)一至八月汇集敌伪财政经济动态资料报告书的密呈》中反映,因日伪的掠夺和交通线屡遭盟军飞机轰炸,沦陷区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的状态,百姓生活困苦,物价飞涨,大米达到了伪钞40元一市斤,白面16元一斤,小米每斗200元,猪肉每斤30元,胡麻油每斤60元,鸡蛋1元钱1个。又如,从1929年至1934年,民国政府先后自主制定实施了4部国定税则,目的是逐步缩小与世界各国关税水平的差距,以期关税基本自主。作为国家税收主权完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验估制度,在抗战全面开始后,因中国海关几乎被日本人占据,形同虚设。到1943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时,民国政府为了换取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部分货物几乎免税,验估制度也无从谈起^[6]。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在西北偏安一隅,继续进行验估业务,有完整的验估机构和验估人员,保留较为翔实资料实属不易。这种制度的延续变

迁,对现阶段探索建立全国通关一体化和国际实际的海关验估制度有很好的传承和聚合作用。

参考资料:

[1][2][3]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海关志[M].(1982—2007),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76-84.

[4]中国海关通志编纂委员会:中国海关通志第六分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3649.

[5]郭永泉.晚清时期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关系之辨析[j].《海关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第三辑》,2016:25.

[6]盛卓禾.近代中国海关验估制度寻踪及启示[j].海关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第三辑,2016:9.

(作者:张益明,兰州海关三级关务监督;张雅淇,兰州海关一级关务员。)